

留美生涯

田 森

人與事



經過三個禮拜的航行，
陳翰笙終於順利地抵達了舊金山。

一九一五年，陳翰笙考入美國麻省赫門工讀學校。

他一面補習英語，一面做工。勤勞奮發的陳翰笙進步很快，不到一年，他已能操非常流利的英語了。第二年他就考入波莫納大學，選擇了植物專業，做着成為嫁接果樹專家的夢。第一年他學習得很努力，但由於自幼近視，眼力欠佳，所以植物分類經常出錯，好心的老師建議他改行。陳翰笙考慮祖國地大物博，礦產豐富，還是學地質對國家有用，就這樣他又改行學了地質。怎奈他的眼睛還是不爭氣，野外作業總搞不好，在萬般無奈下不得不再一次考慮重新轉系問題。

可是究竟改行學甚麼呢？

事也湊巧，正在他徬徨的時候，在一次外出走訪中看到了美國的貧民窟。這次發現對陳翰笙思想震動很大。貧困的美國人在饑寒線上掙扎的景象給他留下了永遠難忘的印象。一面是貧困、痛苦和失望，一面是豪華、奢侈和荒淫。這是多麼不協調的現象啊！然而，它就是最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

「西方的社會並不先進，單純靠科學也未必能救國，要想改造中國，必須首先喚醒民衆的覺悟。」這就是陳翰笙經過一番思索後得出的新結論。

可怎樣才能喚起人民大眾的覺悟呢？

陳翰笙漫步在風景如畫的波莫納大學的校園裡，他沿着一條兩旁鋪滿鮮花的小道上走去，路越伸越遠，他的思路延伸得

比路更遠。中學時代傅熊湘老師講授歷史的情景又驀地浮現在腦際，傅老師講的是那麼動人、那麼有感染力，以致當年他簡直恨不得要砍下曾國藩的腦袋。看來，歷史這門科學對於喚醒人民的覺悟還是大有作用的。

對！改學歷史去！就這樣他決定轉到歷史系，並拜當時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魏斯特加德為師。他匆匆地走去訪魏斯特加德。魏氏欣然同意，這位德高望重的史學家極具眼光，他早就看中了這位才華出眾的小伙子，高興地說：

「好極了！本來你就該學歷史，更何況你的目力也不適合學植物和地質。」

從此陳翰笙轉到了歷史系，專攻世界史。在歷史系他是一位極為活躍的學生，並被選為《學生周刊》編輯。由中國學生擔任美國大學生報的編輯，在當時他是第一個。他幾乎每月都要為這張報章寫一篇文章。鮮明的觀點，犀利的文風不知吸引了多少讀者。隨着時間的推移，魏氏越發

喜歡這位能幹的青年人，當他升入四年級時，便要求他幫助修改同學的卷子，不消說，這件事是秘密進行的。陳翰笙被教授邀請到家中，就坐在他的身旁，每改完一份卷子，便送教授過目。陳翰笙改的卷子既精確又工整。難怪教授不止一次地對陳翰笙說：

「中國真有人才啊！」

陳翰笙以他優異的成績為祖國爭了光。一九二〇年他在波莫納大學畢業了，名列前茅。魏氏確有一雙識才的慧眼。他看中陳翰笙在學術上將大有作為，欣然向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推荐他去讀研究生並兼任助教。

四年的苦讀，終於結出了豐碩的果實。陳翰笙帶着菲爾培塔凱巴協會頒發的金鑰匙離開了母校——波莫納大學。對於只有在全美範圍內的優秀大學生才能獲得的這種榮譽，他是當之無愧的。

（百齡書宿陳翰笙）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聲驚雷，給人們送來了喜悅和歡騰：「四人幫」倒台了！

不久，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胡喬木被任命為首任院長，陳翰笙被聘為顧問。從此他的學術活動日益頻繁。後來他又出任世界歷史研究所名譽所長，既然是名譽所長，本來可以不管事。可出於高度的責任感，陳翰笙對所裡的大政方針、研究規劃乃至具體的研究項目均極關注。他還親自培養研究生。所裡人也喜歡就各種重大問題去請教他。

一九七九年，商務印書館計劃出版「世界歷史小叢書」，他被推選為編委會主任。這套叢書現在已出版了四百八十本，計一千五百萬字，其中重要的選題全部經他親自審定。即使到了後來，他已接近失明時，還要求責任編輯讀給他聽。我曾目睹他聽人朗讀清樣時，那種聚精會神、字斟句酌的情景。誰能估量出在這套四百八十本的叢書中凝聚着陳翰笙的多少心血呢？

他是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也是一、二、三、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作為當年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他總會是克盡己能，常提意見。即使後來年事已高，不再擔任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時，他依然

保持喜歡直言提意見的風格。八十年代中期，他對不重視教育、不重視歷史以及出版發行中存在的問題寫信給胡耀邦，希望引起中央的重視。胡耀邦讚揚了他對工作的認真精神，並囑有關方面關注外國歷史小叢書的出版發行問題，以推動歷史教育的開展。他就是這樣一位為了工作有話必說的人。

除了主編外國歷史小叢書外，作為中國大百科全書歷史卷的主編，他還負責審定大百科全書的外國歷史卷，他同時還兼

他仍在奉獻

田森

任北京大學的教授，因此，不僅要為社會科學院，還要為北京大學培養研究生。

此外，他還擔負了許多社會工作，如「工合」國際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國際文化書院院長、中亞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太平洋學會副會長、中國當代社會研究中心顧問和許多研究所的學術委員。

他還要接待許多來自海內外的朋友，有時候還需要幫助他們解決各式各樣的困難。對於陳翰笙說來，助人為樂不僅是他生活的信條，而且早已成為他的一種生活習慣。他常說，他能有今天，同得到各種

不同人的幫助有很大的關係，所以他自已也習慣於處處去幫助別人。

陳翰笙生於一九八七年二月五日，論實際年齡也超過了九十七歲，可這樣一位近百歲的老人今天想的是甚麼呢？

他沒有考慮自己，也沒有想身後的事情，一個思緒牢牢地抓住他——我該怎樣把自己的知識傳授給年輕人？當有人登門向他請教時，他總是那麼熱情地接待來訪者，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人家，深怕有什麼遺漏。只要一息尚存，他還要奉獻

，只有奉獻才能給他帶來心靈上的平靜。寫到這裡不禁使我想起了著名的哲學家黑格爾的一句名言：「任何一種犧牲，都會伴同著一種享受，伴同著一種自我發現。」

陳翰笙在他無私奉獻的時候，可以感到一種自我存在的價值。在他看來，如果他再不能為社會，為人類奉獻什麼的時候，他的生命價值也就沒有了。今年，在他病體欠佳的時候，我曾去看過他。其時，他竟三次向我重複「如果我不再能對別人有所幫助的話，我就不想活了。」從這簡單的話語中，我又一次看到了一個美麗的靈魂，明白了什麼叫做「鞠躬盡瘁」。

令我欣慰的是，他的生命力真是旺盛極了，在經受了幾個月病魔的折磨後，他又復原了。當我們再次相對而坐漫談當今社會的時候，他又一次對我說：「我現在好了，我需要多教幾個學生。」

他的這句話字字打在我的心裡，使我更加相信：這位近百歲的老人在未來的日子裡肯定會實現他對周恩來總理所許下的諾言：「我要撲在辦公桌上死去。」不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分鐘，他是絕不甘心離開這個世界的。

在他一九八七年寫的《四個時代的我》中曾經說到他有兩個心願。當時他這樣寫道：「如今，我已是九十歲的人了，要做的事情還很多，我想集中精力搞兩件事，一是把自己的知識傳授給年輕人；二是要恢復工業合作運動。」

在和他和艾黎生前的努力下，工業合作運動已經恢復了，這第二個心願可說是初步實現了，可這第一個心願在他停止呼吸之前是永無終結的。

（《百齡耆宿陳翰笙》之三十二，全文完）

（更正：本欄十四日刊出《斬不斷的思念》一文中，「顧淑望」應為「顧淑型」，特此更正。）



一九七一年，陳翰笙被「解放」了，從湖南回到北京，那時依然是「四人幫」橫行的歲月。深深了解陳翰笙的周恩來總理知道他秉性耿直，怕他重新工作後又難逃再度受迫害，出於對老同志的愛護，曾托人捎口信給他，請他考慮是否離休。當時他已七十四歲，出生入死，奮鬥了一輩子，且雙目均患重疾，也該休息一下了。

可陳翰笙不願意。他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除了感激總理的關懷外，明確表示了作為一位革命者，他決心為人民的事業奮鬥到最後一息。

陳翰笙這種為人類進步事業獻身的精神是始終如一的。早在一九三三年他在一篇談夢想的文章中就用樸素的語言寫道：「假如夢想就是希望，我希望着我個人的工作能助長人類的進化，而我個人的生活不違反這樣工作的志趣。」他是這樣寫的，也是這樣做的。

一息尚存，他也要為人類的進化做點有益的事情。那年頭，「讀書無用論」正在中國大陸肆虐，他目睹不少青年人被弄

得無心向學，如此下去，中華民族又何以能興旺呢？必須改變這種狀況！他決心用教授外文的辦法，來吸引年輕人的興趣，增長他們了解世界的本領，以便來日報效國家，振興中華。就這樣，在他當時簡陋的寓所的一間小房子裡辦起了外文班，既教英文也教德文。他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精神，感動和激發了不少青年人學習的熱情，鼓舞了他們對新生活的追求。

一息尚存就要工作

田森

書館以《英美短篇時文選讀》為名出版了，深受廣大讀者歡迎。從那時到現在，他堅持不懈教授外文，在他那學過英文、德文的人，少說也有三百多人，其中有普通的學生、工人、演員甚至副教授。如今他們已遍佈全球，事業有成。此外就各種不同問題前來向他討教的青年人更是難以勝數。

為了這些後學者健康成長，他花了大

陳翰笙免費教外文的訊息很快在京城傳開了。一時登門求教的人越來越多。而陳翰笙當時定了一條原則，只要是真正勤奮好學的人，不論其出身、工作、學歷，統統歡迎。人最多的時候，不僅上午、下午，連晚上都有人來學習。學生用的教材，也是他自己編選的。為此他不僅要給學生上課，還要親自搜集資料，有時甚至還跑書店、圖書館，以便把最好的教材提供學生們。他自編的這些教材後來被商務印

量時間以各種途徑從外語上、學習上和做人上去精心培養。在不少青年的成功中，不知凝聚着陳翰笙多少的心血。他經常收到來自全國各地年輕人的信件。一位叫祝江白的學生在給他的信中寫道：「從我第一次跟您見面的那一天起，我就為自己找到這麼高明的老師而感到幸福和萬分高興。您的慈祥、親切、和藹、幽默、機智和敏銳，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我多麼渴望能夠再得到您的指教，就像乾枯的

禾苗渴望得到甘露的滋潤一樣。」這封信道出了許許多多同陳翰笙有過接觸的青年朋友的共同看法和心願。陳翰笙的學生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的評價：「我們從他那裡學到的絕不只是英文，還有做學問的基本功和做人的道理。」

一次，他要我閱讀一篇發表在美國《思潮》雜誌上題為《爭霸全球》的文章，我讀後說：「寫得不錯！」他高興極了，笑得那麼天真，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出自他的一位青年學生之手。對於他說來，還有什麼比看着自己的學生成材，更令他感到欣慰的呢！

他除了為自己安排了教書育人的工作外，還用英文為《中國建設》寫了一些文章。

這就是他從湖南回京後為自己找到的許多可做的「工作」。縱然在那「四人幫」橫行的日子裡，他依然要想方設法做一點「助長人類的進化」的工作。他在經受「四人幫」的排斥、打擊時，仍念念不忘要為振興中華多做貢獻，這是一種怎樣的奉獻精神啊！難怪他贏得了人們對他由衷尊敬和感激。

沙漠物質享受

田 森

人與事



陳翰笙，這位國際知名學者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這是不少人關心的問題，特別是他年近百歲而又身體健康，更引起有些人的關注。我就被不同的人多次問過，他到底吃了些什麼好東西？也有些人由此很關心他的家庭生活。

對於他的日常生活似乎可以用九個字來概括：「簡樸、規律、時間觀念強。」

他從不吸煙、不喝酒，甚至連茶也不飲。大約是一九三五年的元旦，當時他和郭沫若都旅居日本，那天他去探望郭，兩位學者談得很投契，又正值新年，所以陳翰笙破例地喝了酒，沒料到這次竟喝醉了，結果倒在「榻榻米」上睡過去了。後來還是郭的日本夫人通知陳翰笙夫人，用車把他接了回去。此後他就再沒有喝過酒。據他後來回憶說，「我一生不吸煙，不飲酒，樂於助人，剛直不阿，這同小學受到的良好教育有關。」

他一九五一年從海外回京後，一直住在北京東華門一所普通的平房裡，每年冬天都要靠蜂窩爐取暖，一直到搬進復興門大樓前，住了有三十多個春秋。有時到上海出差，由於他的部長級別，總是被安排在有空調、地毯的高級賓館裡，可他對這一切毫無興趣，寧願到他妹妹家裡去與外孫同住在一間普通的房子裡。

他覺得這樣反而更自在一些。幾十年的風雨生涯磨練出了他艱苦樸素的風格，對物質享受看得很淡很淡。看來，一個事業心很強的人，相對地說，對物質享受都比較淡漠，沒有那麼多時間和精力去琢磨享受的事情。

他生活很有規律，幾十年如一日。每天按時起床，也基本上按時睡覺。飲食有節亦有時，從不大吃大喝，吃的很簡單，但喜歡甜食，這可能同他長期在國外生活有關。在美國求學時，他的夫人也半工半讀，在一家罐頭廠裡做工，經常可以給他帶些甜食回來，這對他養成愛好甜食亦不無關係。這位在外國生活了多年的中國學者，不論任何時候，當他坐在椅子上的時候，從來也沒有翹起腿來的習慣。在這些細小的地方，他是很講究的。從所有這些地方，你都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文化對他的影響。他還非常注意中國的禮儀。如上所述，他長我三十三歲，可他卻要他的女兒叫我「田伯伯」，每當我聽到這樣稱呼都感到很不好意思，可這是他們家的規矩。與此同時，我又親自看到他同小孫子在一起捉迷藏玩得好不開心，更目擊他的孩子們同他就各種問題自由辯論的寬鬆情景，充分顯示了他的民主思想和作風。看來，在他的家庭生活中，我們也很容易感受到中西文化合璧的氣氛。他的時間觀念特別強，有一個生動的例子很能說

明這一點。《大公報》名記者楊剛為人爽朗、率直，在美國時同陳翰笙常見面，也很談得來，可以說是老朋友了。一次楊剛求見陳翰笙，由於楊剛晚到了一分鐘，陳翰笙就走了。幾年前，我曾問陳翰笙，為什麼要那樣做，就不能多等人家一會兒嗎？可他卻斬釘截鐵地說：「在現代社會，每一個人都應當養成嚴格守時的習慣，這對大家都有好處。」

至於談到穿，他就更不講究了。他如今穿的那件深色呢大衣，還是五十多年前在國外買的。他的內衣褲不知打了多少塊補丁。當他的妹妹勸他添置新衣裳時，他總是風趣地回答說：「我覺得穿上舊衣服更舒服，只要思想新就可以了。」

他也主張吃「補品」，但那是特殊的「補品」。它不是別的，而是辛勤勞動帶來的工作上的成果。這種成果，對他說來，比任何山珍海味都更有效。每當他在工作中獲得新成就時，每當他的學生取得了優異的成績時，一種收穫的喜悅情不自禁地激蕩着他的心。他在欣賞之餘，總是感到自己做得還不夠，於是他又下定決心去做更多的事情，一種投入新的戰鬥前的興奮又攫住了他的心，而這就是他最好的「補品」。一位醫學界朋友曾對我說過：「好的情緒是長壽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完全相信這個說法，而對於陳翰笙說來，只有工作上的成就才能給他帶來真正好的情緒。

陳翰笙的愛妻顧淑賢被迫害致死，這位同他風雨同舟近半個世紀的戰友、伴侶去世後，給他內心帶來巨大的創傷，使他長久地陷於痛苦中，用他自己的話

說：「形影相弔，孤苦無依，經常挑盡孤燈待曉天」，由此可知，他家破之後是何等的愁結滿懷！就在這個悲痛的時刻，比他年幼十八歲的胞妹素雅，毅然決定離開自己的家，到北京來照料瀕臨失明的哥哥，為他處理對外聯繫，為他讀材料，有時還要為他覆信，更重要的是給他帶來了安慰。她在翰老家住近二十年，雖然有時不得不回家看看，但她畢竟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在了自己胞兄的身上，這是非常難得的，難怪朋友們給她送了一個雅號「偉大的妹妹」。為了讓陳翰笙的晚年過得更好，素雅還把她的女兒過繼給翰老，於是從來沒有子女的陳翰笙晚年倒得了一個女兒，她的名字叫瑜瓊，是位內科醫生，對翰老照顧得很好。去年翰老病重時，就是瑜瓊和她也是醫生的丈夫的精心護理，才使老人家化險為夷。

陳翰笙在夫人逝世後，總算又有了一個溫馨的家。他的胞妹素雅、女兒瑜瓊、女婿德生和兩個上大學的外孫和外孫女都同他生活在一起，給他帶來了多少生活上的樂趣和精神上的安慰啊！

人是需要溫暖的，人不能沒有安慰。我相信生活在這個溫馨家庭的陳翰笙會得到精心的照料，穩步地跨入廿一世紀。到那時，我絕不負素雅的重託，定將把一本《三個世界的陳翰笙》貢獻給海內外的讀者。我完全相信，陳翰笙在他最後的歲月裡還會繼續放出奪目的人生光彩來。一個高尚的人的心裡開放的鮮花將是永不枯萎的。

人與事



陳翰笙的東華門舊寓和復興門新宅，我都不知去過多少次，用句民間的俗語說，恐怕是踏破了門檻。一次我到東華門寓所去看他，我忽然發現他屋內的陳設多了一幅水彩畫。畫面上美麗的富春江立即吸引了我的視線，仔細一看在畫的左端還有他親筆題的一首詩。當他發現我已注意到這幅畫時，便懷着深沉的感情為我背誦了一遍他的這首新作，那是獻給他的亡妻顧淑望的。詩云：

「浩蕩寒溪送骨灰，
淒淒水上我徘徊。
何時物化應做伴，
攜手夜台笑語陪。」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五日，顧淑望這位中國的教育家、攝影家因受迫害含恨長逝。當時陳翰笙正被隔離審查。由於顧淑望患癌症病危，陳翰笙被迫於十一月二日押回來處理一些事情，這時候顧淑望已處在彌留之際，她忍着巨痛掙扎着說：「翰笙，我不行了，今天你能留下嗎？」然而妻子臨終前的這個要求卻被造反派斷然拒絕了，給雙方留下了永遠彌補不了的遺憾！

陳翰笙忍着巨痛離開了淑望，果然第三天，她就懷着無限的悲憤撒手人寰。陳翰笙又一次被押解回家，看到顧淑望的遺體竟被扔到院子中的一塊木板上，陳翰笙不禁失聲慟哭，痛徹心脾。人生有情，教他如何能不心碎？正當他悲痛欲絕的時候，那兩個押送他的造反派卻變得異常忙碌起來，他們想趁機拿點什麼。其中一個造反派，竟不顧一切，硬把死者手上戴的一個陳翰笙過去送給她的金戒指要取下來。目睹此景的陳翰笙不由得怒火中燒。他終於按捺不住心中的悲痛和憤怒，說了一句，「那是她可以留給我的最後的紀念品了。」可是那個造反派厚顏無恥，竟把它當着陳翰笙的面裝進了他自己的腰包。這就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真不知教這位「奉命海外奔東西，當年為黨流熱汗」的陳翰笙說些什麼才好！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他只好任憑滴滴熱淚落心頭，終日默默不語。在隔離審查的房子裡，他伏案寫啊！寫

斬不斷的思念

啊！只不過不是造反派要他寫的交代材料，而是一首又一首悼念亡妻的詩。在那時光，他也只有把巨大的痛苦化做無數的輓詩。然而一個信念卻牢牢地掌握住他，「即使為了淑望，我也要更加發奮。對於一位含恨而去的戰士說來，只有生者的堅持不懈的戰鬥精神才能告慰死者的英靈。」

陳翰笙是一個非常堅強的人，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安慰，再說那種時刻又有誰能去安慰他呢？又有誰敢去分擔他的痛苦於萬一呢？做為歷史學家，陳翰笙相信，中國的這場悲劇必將過去，一切終究都會變好的。當時擺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條道路——等待。於是他

開始盼啊！盼啊！一直盼了多少年，終於盼來了「四人幫」的垮台。一九七一年他被解放後，就開始籌劃要把亡妻的骨灰撒到富春江，這是因為陳翰笙於一九六二年同顧淑望同遊過富春江，富春江那迷人多姿的風光給攝影家顧淑望留下了美好而難忘的回憶。她會對陳翰笙說過，將來她去世後，希望她的骨灰能被撒到此江中。陳翰笙記住了妻子的這個囑託，所以，他剛一被解放，就在次年一月，在胞妹素雅陪同下，專程護送淑望的骨灰到富春江，撒入江中，了卻了他自妻子含恨而去後一直牽掛的一樁心事。一九七六年六月，中國攝影家協會又為顧淑望舉行了隆重的追悼

田森

大會。國家領導人宋慶齡、宋任窮等同志均送了花圈。

顧淑望也是無錫人，早年畢業於北京女子師範，一九一七年赴美留學。陳翰笙第一次認識顧淑望是一九一九年在美國舊金山的一個碼頭上。由於志趣相投，兩年後他們就在美國的西雅圖結婚，在一起生活了四十七年。

顧淑望不僅是一位出色的攝影家，而且是一位教育家，早年曾任北京著名的藝文中學教務長，她像一個細心的園丁愛護幼苗成長一樣，為祖國培養過不少人才，建國後曾任北京市委書記的劉仁當時就是藝文

中學的學生。當年率領藝文中學學生參加李大釗親自領導的反對各帝國主義最後通牒和北洋軍閥段祺瑞賣國行徑大遊行的也正是顧淑望。早在青年時代，他倆就曾相約，要為偉大的中華民族的振興而共同奮鬥。

回國後，顧淑望這個在美國研究電化教育的專家，由於革命工作的需要，改行去做中蘇友協副秘書長、中國攝影家學會常務理事。她在自己的工作做出了出色的成就，曾被選為全國婦聯的「三八紅旗手」。生前她拍過許多頗有影響的好作品，並參加過全國的攝影展覽，她還兼任《中國建設》雜誌的圖片顧問。她不僅有堅定的性格，在艱險的地下工作的歲月裡，與陳翰笙並肩戰鬥，出生入死，臨危不懼，而且是一位很有情趣的女子，她會演奏古箏，陳翰笙常在她優美動聽的古箏的伴奏下提筆賦詩，不消說，自有一番情趣在心頭。

可惜，這樣一位難得的女性竟被「文化大革命」迫害致死。難怪陳翰笙痛心至極。為了永遠紀念他的最可懷念的伴侶，陳翰笙每逢顧淑望逝世的那一天，都要絕食一日，任他的思緒縈繞在亡妻的左右。昔日海外「花前月下，河畔林邊，海闊天空談個沒完」的情景又浮現在他的眼前。在淑望仙化後的歲月裡，陳翰笙只有用更加努力地工作去驅除他心中永遠驅除不了的遺憾。

（《百齡耆宿陳翰笙》之二十九）



據我的多年觀察，陳翰笙在學術上所以能取得卓然的成就，成為國內外公認的著名學者，還有一個奧秘，那就是他驚人的勤奮。

七十年代初，他被「解放」了，隻身由湖南回到北京。文革中身心受了那麼嚴重的摧殘，照理應當好好休息一下，可他並不這樣想。我去看他時，他抱怨的不是受了那麼多的委屈，而是這種無所事事的日子他實在過不下去。記得當時他還曾把自己寫的一首詩寄給我，其中就有：「而今幽居東華門，豈可長此成閒散」的詩句，充分表達了他內心的焦慮。沒多久，他終於想出了一個好辦法來擺脫這種困境：埋頭編起書來。在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協助下，編了一部十卷本的洋洋三百多萬字的《華工出國史料彙編》，用雄辯的史料揭露了西方資本主義掠奪海外殖民地，殘酷剝削落後國家勞工大眾的野蠻罪行，填補了我國史學研究中長期被忽略的一個方面，而且也了卻了他早在三十年代就計劃做而未果的一件心願。

陳翰笙在年邁又染眼疾，視力所剩無幾的情況下，還要發奮編書，去完成一項卷帙浩繁，將近三百五十萬字的巨大學術工程。這是怎樣可貴的治學精神！正是這種精神給他帶來了豐碩的學術成果。沒有這種精神，是難以勝利地到達彼岸的。

在做學問上，陳翰笙最反對隨波逐流、人云亦云。他既不唯書，也不唯上，而是重視從實際出發，在佔有大量可靠的第

求實精神

手材料的基礎上，得出合乎邏輯的科學結論。正是由於這種求實精神使他早在一九四八年，從中國的國情和世界局勢的發展出發，對解放後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提出了完全不同於五十年代後期和六十年代的做法，倒是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提出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基本上脛合。

陳翰笙的觀點令一位史學家不僅為之驚訝，更為之喜悅。這位史學家寫道，陳翰笙早在建國前「對我國解放後的生產方

式、建設步驟、工業化特點、建設資金來源的預見……使我喜出望外，好像勘礦隊遇到了露出礦苗的富礦。從此，我對我自己提出了一系列問題：陳翰笙準確的歷史預見是不是可以證明歷史學的實用價值？他的史學思想在哪些方面對推進「四化」具有現實意義？他的史學思想能不能有助於了解世界上不發達社會的發展？」其實，陳翰笙能夠科學地預見到未來，不僅

田 森

因為他是一位史學家，還因為他是一位崇尚求實的學識淵博的社會科學家。沒有從實際出發的治學精神，陳翰笙也就不可能在社會科學領域內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難怪在一九八五年，當他從事學術活動六十周年的時候，中國社會科學院為之舉行隆重的慶祝集會。

在我同他近四十年的交往中，每論及治學之道，他都不止一次地談及：「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迷信任何權威」。

他非常推崇明清大思想家、大史學家黃宗羲說的名言，

「小疑則小悟，大疑則大悟，不疑則不悟。」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

直到今天，他還把黃宗羲說的這些名言，掛在自己的書櫃上，做為座右銘。

陳翰笙治學之道，給我留下的又一個深刻的印象是，他主張研究社會科學的人，必須格外重視討論，因為討論可以啟發思想，深化認識，鑒別是非。

他還不止一次地打比喻說：「正如自然科學必須通過實驗來證明正確與否，社會科學的是非問題則必須通過廣泛而反覆討論來加以明辨。」

他又強調說：「討論是社會科學發展的重要手段。」

由此看來，重視資料、重視討論，一切從實際出發，構成了陳翰笙學風的主要特點。



人們都說，陳翰笙博學多才。他是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還是國際問題專家。的確，他是一個才氣橫溢、熱情奔放的學者。就連他寫的好些舊體詩也頗受行家的稱讚。

他惜時勝金，極少參加文娛活動，同說得來的朋友談心，便是他最大的精神享受。

要做學問，就必須重視資料。前幾年，當他的眼睛還有微弱的視力時，他仍孜孜不倦地搜集各種有用的資料。

他曾以：「如果沒有掌握足夠的資料，或未經過密的分析，決不可以輕易下結論」來自勉，並把這句話題在他自己的一張照片上。他的老朋友周谷城說過，陳翰笙「在他治學過程中，重視資料的精神，儼然是他的第二天性。」

多少年來，他不僅把對自己有用的材料隨時積累起來，就是對朋友用得着的材料，也不惜花時間把它們收集起來。有一段時間我在研究拉丁美洲的問題，曾不斷收到他給我寄來的有關拉美問題的剪報，而且每一份剪報都註有出處和日期。每當我翻閱這些剪報時，胸中就不由得湧起了對他的感激和尊敬。他自己平時忙得不可開交，卻還惦記着朋友的研究工作，而且做得那麼認真。這不僅表明他對朋友事業的關注，同時也說明他極其重視資料，確如周老所說，已經成為他的「第一

天性」。

他一生，參加社會工作佔去了相當一部分時間，特別是動蕩不安的地下鬥爭是非常消耗人的精力的，可他依然擠出時間寫了那麼多著作、文章和調查報告，可以說是著述等身，由此人們也就可以想見他治學的勤奮了。要想在這裏羅列他的哪怕是主要的著作，都是不可能的，我只能舉幾個典型的例子，借以說明他寫的東西內容極為廣泛。其中既有《人類的故事》這類知識讀物，又有《華南農村經濟問題》這類經濟學著作，《難民的東北流亡》這類

治學之道

田 森

社會學著作，《印度莫卧兒王朝》這類歷史學著作，還有《國際新局面》這類國際問題著作。他的寫作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不少作品是用流利的英語寫成的。而他寫的大量舊體詩完全可以出一個集子。至於他寫的文章，涉及的面就更為廣泛了，總之，從上述遠不完備的敘述中，人們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難得的傑出的學者。

陳翰笙能在學術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同他提倡的治學之道有密切的關係。他曾經對我說，做學問必須具備

「三心」。

第一是虛心，虛心說起容易做起難，特別是當一個人小有成就的時候，每每不易正確地對待自己的成就，可是沒有了這一條，一個人也就難以在治學的道路上繼續狠下功夫，破浪前進了。

第二是專心。光有虛心也不行，還必須要專心。在特定的時候，要把自己研究的問題集中在一點上，要把當時的全部思緒都投入到這個焦點上。要知道，反覆的琢磨有時就會產生出思想的火花。如果有可能的話，畢生研究一個問題也不是不可取的，如原蘇聯有位史學家，專門研究拿破崙，把畢生的精力都用在這上面了，後來果然成為研究拿破崙的權威。總之，不管

是研究一個問題也好，研究多領域也好，在特定的時間內，務必要專心致志地，反覆琢磨你所研究的問題的核心，從而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礎上，找到最合乎邏輯的結論。

第三是恆心。有了虛心和專心仍然不夠，還得要恆心。這就叫做看花容易繡花難，立志容易堅持難。只要你看準了一個方向，持之以恆，積以十年，肯定能出成果。陳翰笙的「三心」說，無疑對立志做學問的青年朋友有很大的幫助。



一九七九年九月間的一個下午，陳翰笙正在東華門寓中同我討論《庇隆傳》的稿子，一位端莊的夫人突然來訪。她手捧一朵珍貴的靈芝，陪同她來訪的女兒把她介紹給陳翰笙後，她非常鄭重地把手中的靈芝獻給了當時已八十二歲高齡的陳翰笙，並激動地說：

「我要雙重地感謝您！」

她究竟是誰呢？又何以要感謝陳翰笙呢？

她是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說來話長。文革中，劉少奇被打成了叛徒、頭號走資派，從國家主席一落而成為人民公敵。他的孩子們也遭到株連。不消說，大學之門早拒他們於千里之外，誰個敢收黑幫頭子的子女呢？找個合適的工作做罷，同樣難如上青天。

就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劉少奇的兩個女兒——平平和平平不甘向黑暗勢力低頭，決定發奮自學英文。但是在自學的道路上，她們遇到了一個又一個的困難，迫切需要別人的幫助和指點。可是在那個年頭，有誰願意擔風險去幫助「叛徒」的女兒呢？然而，天無絕人之路，正當她們求助無門的時候，她們聽到了陳翰笙的名字。陳翰笙滿腔熱情地幫助青年的事跡深深地感動了這兩位小姑娘。她倆暗自盤算，

也許這位老人可以幫助自己。「對！找陳翰笙去！」

老人沒有令她們失望，他熱情地接待了她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她們的請求。

在陳翰笙的精心培育下，這兩個孩子學得很努力。她們從陳翰笙那裡不僅學會了英文，而且學到了許多做人的道理和觀察社會的本領。她們變得比過去聰明、成熟、堅強了。這令陳翰笙欣慰不已。可就在這時，陳翰笙給頭號走資派的女兒教英文的事被傳了出去。這是「左派」們難以容忍的。有人運用手中的權力要陳翰笙將

為「叛徒」劉少奇子女授業

田 森

所有學生的名字、他們父母的名字和單位統統開列清楚，交給他們。

當時在他那裡學習英文的青年人很多，除了劉少奇的孩子外，也還有其他「走資派」的孩子，如萬里、王炳南等人的孩子。當然更多的是普通人家的子弟。

陳翰笙的心是坦然的。他把名單交出去後，照舊上他的課。他理直氣壯地說：「縱然劉少奇有千般問題、萬般不是，與孩子何關？難道共產黨還能搞株連嗎？我教學生為國家培養人才，分文不取，何罪之有？」

他根本不理睬來自各方的壓力，也不顧親友好心的勸告，反而更加投身於輔導工作，我曾親眼目睹他用微弱的視力，艱難地為劉少奇的女兒修改她從濟南寄來的英文信。當時他的右眼視距只有十公分，而左眼的視距也不到一米，且繼續呈下降趨勢。然而，他心甘情願付出健康的代價，哪怕是失明，他也要把這些孩子培養成才。他這樣做也是為了用自己的行動來滋潤這兩個無辜受傷的孩子的心靈。

一次從醫院檢查視力歸來，發現右眼已接近失明，他的胞妹素雅難過地流下了

眼淚，要他遵醫囑珍惜那僅有一點視力。可他誰的話也不聽，一如既往地為他的學生們上課。

那年頭，人們都千方百計地想離是非之地遠一點，更不要說幫助劉少奇子女學英文了，可陳翰笙偏偏要把這種足以引火燒身的事往自己身上攬。因為他堅信孩子是無辜的，劉少奇主席也是無辜的。

所以王光美出獄不久就去探望陳翰笙，向他獻上了珍貴的靈芝，借以表達她的敬重感激之情。那天他們是第一次見面，卻一見如故。

分手時，陳翰笙神情嚴肅地對王光美說：「應當早日為少奇同志平反！」這就是一位正直的老人從心底深處發出的聲音。

縱觀陳翰笙的歷史，在每一個緊要的關頭，在每一個嚴重的時刻，這個貌似文弱的書生，都始終顯示出英雄的本色，頂着惡勢力的壓力為祖國工作；在他看來，平湖泛舟不是革命者的生涯，只有破浪前進方能顯出英雄本色。所以對於他說來，幫助劉少奇的女兒完全是一種合乎他生活邏輯的行動。

陳翰笙的心血沒有白費。當年在他身邊學習英語的劉平平和平平如今都已在事業上取得了成功，這是最令陳翰笙欣慰的。姐姐劉平平後來赴美國留學五年，先後取得一個學士、兩個碩士和一個博士的學位。一九八七年學成歸國後，被任命為北京中國食品研究所所長。妹妹劉亭亭，八十年代初考入美國波士頓大學，畢業後又入該校商學院深造，獲碩士學位，其後又在哈佛大學商學院進修兩年，畢業後在美國著名的洛克菲勒公司工作，現今已自創公司，出任總裁，活躍在美國的企業界。她們能夠有今天，固然得力於自己的努力奮鬥，但畢竟在她們的成功的中也凝聚着陳翰笙所付出的心血。



一九七五年初，由於「四人幫」的肆虐，學術研究很難開展，寶貴的光陰都白白地浪費了。其時我的心情非常苦悶，頗有度日如年之感。當時，陳翰笙就曾建議我不妨研究一下法國女英雄貞德的歷史，在適當的時候還可以寫一本她的傳記。我接受了他的意見，開始搜集有關貞德的資料。

七五年一月間的一個下午，我正在家裡整理貞德的材料，聽到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是陳翰笙，我趕忙請他進來。他看到我桌上堆滿了有關貞德的材料，很高興，連聲地說：「你真幹起來了！」

正是桌上的材料又引發了翰笙的一通議論：「貞德小小的年紀幹了那麼一番大事業，可惜如今的中國青年一代被人毀了。」

接着他便大罵江青：「呸！好一個臭妖婆江青。禍國殃民！……」

那時光，環境是險惡的，我勸他壓低一下嗓門，可他並不聽從我的勸告，依然罵個不停。

我指指窗戶，意在告訴他，這種四合院房子的隔音很不好。可他說：「我不怕！」

「前不久，在我們外交部機關的黨小組會上，我就公開地批評江青。」我聞話不由得一驚。那時雖說人們對「四人幫」的不滿日甚一日，一些相好的朋友在一起也少不了要發發牢騷。但敢於在黨的小

組會上公開批評江青，敢於對江青說「不」字的，我還沒有遇到過。人們幾乎都是會上一套，會下一套，過着兩重人格的生活。彼時彼刻，我又怎能不對陳翰笙的硬骨頭精神暗自起敬呢？

「你在公開場合說話，還是不注意一些好！」我當時還是謹慎地提醒老人。他卻回答：

「這樣暗無天日的日子，我實在過不來。我早已置生死於度外，有時候我真恨不得到天安門廣場上去，點燃自己，以身殉國，借以呼喚人們的覺醒。」

他說話的神情很嚴肅，我知道這不是一句戲言。

我能夠理解這位學生獻身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老人，內心的痛苦到了怎樣一種程度。

早在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剛揭開序幕時，同許多老幹部一樣，陳翰笙並不理解文革，也沒有預料到後來會發展到那樣瘋狂的程度。

最初，他被隔離在位於東交民巷的外交部招待所，主要是審查他和外國人的關係，後來由於周總理的干預，他很快就被釋放了。

然而造反派並沒就此罷休。從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八年間，陳翰笙曾多次被抄家，可每次除了拿走一些書以外，並無所獲。

隨着運動的深入，他再一次被關押，被隔離在國際關係研究所的一個地下室裡。這一次是由身著戎裝的軍人審理專案的，可見他的問題之嚴重。他被勒令下跪聽審。

可他死也不跪，後來索性一屁股坐到地上，一言不發。面對逼供信，陳翰笙堅持說：「不！我沒有問題！」弄得專案組也無計可施。

陳翰笙身陷囹圄時，三十年前他所目擊的蘇聯肅反擴大化的悲劇，又重新掠過他的腦際，當年他就很不理解斯大林清除異己的做法，可萬萬沒有想到，這場悲劇

田森

後又在中國重演了，且打擊

面之廣，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在無力改變這種錯誤做法的情況下，他情不自禁地向同室的難友發出了「在劫難逃」的悲嘆。這位清醒的歷史學家當時已預見到國家前進的步伐將因此倒退很多年，然而身陷囹圄，「愁心一片對誰吟？」

不久，他再度被提審，說他是國民黨CC派特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陳翰笙卻很平靜地對提審者講了下面一段話：

「我從來沒有加入過CC派。一九三三年四月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被迫遷到南京。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陳立夫，他也是CC派的領導人，曾通

過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先生邀我去中宣部做一次學術報告，當時我考慮若不講定會令陳立夫不快，以後工作勢將難做。答應他吧，又不知講些甚麼為好，所以我很躊躇，待我將自己的考慮告訴蔡院長後，他力主我應當去講。結果我以《田賦與田租的關係》為題講了兩個小時的光景。這就是我同CC派的全部關係。」

在關押了九個月之後，確無實據足以說明陳翰笙是CC派分子，他終於被釋放了。接着又被送到湖南「五七」幹校去勞動改造。由於嚴重的眼疾，他勞動時不止一次誤傷小苗，所以就分配他負責送報送信。陳翰笙做事從來一絲不苟，即使做收發也毫不例外。他給人送信，非得把它交到本人手中，從不讓第二個人轉交，因此有時一封信要送好幾次，這一點給當時在幹校勞動的衆難友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然而，個人的不幸對他說來，又算得了甚麼呢？他所痛心的是文革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精神災難。對教育的不重視、道德的滑坡、兩重人格的現象都同那次浩劫有着直接的聯繫。年高德劭的陳翰笙一直在呼喚加強道德建設。他在《四個時代的我》中說：

「言行不一很不好。說的是民主，幹的是獨斷，說的是為人民服務，幹的是為自己謀私利，這是不道德的行為。」他自己正是一位敢於堅持真理，面對黑暗和高壓勢力說「不」的優秀知識分子的代表。（百齡著《陳翰笙》之二十五）

他敢說「不」



一九五一年一月，陳翰笙不顧外國朋友的挽留，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毅然回到祖國的懷抱。總理設宴歡迎他歸來。這是一次工作晚宴。在座的尚有陸定一、李克農、章漢夫、喬冠華等。

總理高興地說：「這下子可把你盼回來啦，也該爲我分一點擔子。我現在任務很重，還要兼外長。你來做副外長，幫幫我的忙吧！」

回到祖國的懷抱，體驗着親人的信賴，這是何等的幸福！然而，陳翰笙還是毫不猶豫地連連搖頭說：

「不行啊！總理。你看，咱們現在吃中餐用的是筷子，可吃西餐卻要用叉子。我是筷子料，不能做叉子用啊！」他的風趣的回答逗得總理笑了。他沒有勉強陳翰笙，而是用一種商量的口吻說，

「那你看做些什麼工作更合適呢？」他望着總理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慢慢地說：

「還是讓我去搞點研究工作吧！」總理點了點頭。

幾天之後，周總理給陳翰笙送來了外交部顧問的聘書，並指示李克農爲他配備幾名助手，很快就搞起了一個研究國際問題

題的班子。

二十年代，陳翰笙出於革命的需要，曾在國民黨政府擔任過外交部長的顧問。如今他又被聘爲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外長顧問。彈指一揮，竟二十多年矣！真是滄海桑田，換了人間。

陳翰笙婉言謝絕出任副外長一事，很快就傳出去了，頗引起一番議論，有人甚至說，他不該那麼清高，還有人爲他惋惜失去了這個好機會。

可陳翰笙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比誰都

國際問題專家

田森

更清楚，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長處爲國家服務。說實話，他不是搞行政的材料，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常常說話不會拐彎抹角，說得太直了，容易得罪人。從事科學研究對發揮他的長處的確更合適。

所以，五十年代他不僅謝絕了陸定一的邀請，未去做北京大學副校長，還婉言推辭了錢俊瑞要他出任北京農業大學校長的要求，後來又謝絕了要他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的意見。

他是一個在國際問題上造詣很深的專

家。一九五一年周總理曾經問他朝鮮戰爭還要打多久。

他沉思了片刻，各種論據像閃電一般地掠過他的腦際，不一會他回答說：

「大約還得打兩年光景！」

果然，在一九五三年，朝鮮戰爭停戰了。

一次，我半開玩笑地問陳翰笙：

「你又不是算命先生，怎麼算得出來呢？」

他凝視着我那好奇的表情，愉快地回

答了我的提問：

「要做到這點，也難也不難。只要你弄清了雙方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歷史諸種因素的關係，雙方軍事力量的消長和整個國際宏觀形勢的背景，那麼你就會大體上有個譜了。」

前外交部長陳毅生前也很欣賞陳翰笙。

一九六二年他倆同在北戴河休養，陳毅專門向陳翰笙徵詢培養外事幹部的意見，陳翰笙率直地批評了外交學院在培養人才中的一系列問題。陳毅頻頻點頭，欣然接受。他一從北戴河回到北京後，便親兼外

交學院院長，大力整頓該院的工作。六十年代陳翰笙曾著文批評印共關於印度農業經濟的觀點，當時有關方面不同意發表，陳毅力排衆議，支持了陳翰笙，這才使得他的那篇論述印度土地改革的文章得以問世。

由於陳翰笙長期在海外工作，結交了衆多的外國朋友，文革開始後，同外國人的交往自然成爲他的一大「問題」。運動剛開始，陳翰笙就被押到外交部招待所隔離起來，要他交代同外國人交往的關係。要不是周總理得悉此事後下令釋放陳翰笙，說不定他又要受多少折磨！這就是周恩來二保陳翰笙。

然而事情並未就此結束。隨着運動的深入，他終於被搞得家破人亡，幾乎失明的眼疾又給他帶來了種種意想不到的困難。一些深知他同周恩來關係的朋友都勸他請總理幫助。可是每當陳翰笙從報上看到周恩來那日益消瘦的臉龐時，一種痛楚的心情頓時從心底湧起，他知道總理的日子更艱難、更沉重。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總理不幸與世長辭，陳翰笙頓時沉浸在無比悲痛之中，他失去了一位真正的相知相識者。

（《百齡耆宿陳翰笙》之二十四）



反右以後，陳翰笙多少成了一個有爭議的人物。一些人對他多有微詞，甚至也有公開指責他的，無非是說他右。加上他那喜歡直言的個性，也的確爲他招惹了不少是非。

反右開始後，羅隆基被指責爲陰謀反黨，可陳翰笙不以爲然。他過去認識羅隆基，在他看來，這個高個子愛講話的人不過是一位好自我表現的人，未必會搞甚麼陰謀。所以他公開爲羅辯護說：「我不認爲羅隆基是搞陰謀的人。」接着他還說了一些其他「不合時宜」的話，這下子可引火燒身，捅下了大漏子。只是由於周恩來的力保，他才倖免於難，否則右派的帽子早已準備好要戴在他頭上。

周恩來爲甚麼要保陳翰笙呢？他倆又是甚麼關係？

周恩來認識陳翰笙是在一九五一年一月，然而他們相知卻早在二十年代。一九二一年陳翰笙由新中學會領導人高仁山和查良釗介紹參加了當時的進步團體——新中學會，周恩來也是新中學會的成員。後來在長期的鬥爭中，周恩來常以黨的領導人的身份向在海外的陳翰笙發去指示，委以重任。

一九四六年早春，陳翰笙接到周恩來的指示，要他從印度赴美國同美共保持接觸。

兩年流亡印度的生活就要結束了，新的任務在等待着他。陳翰笙思緒起伏，想得很多，也很遠。

四月間，一艘由加爾各答駛往美國的輪船把陳翰笙載到了當年他求學的國度，他對這裡是那樣地熟悉，當他第三次踏上美國的國土時，他已經是一位知名的學者了。抵美後，華盛頓州立大學馬上聘請他爲客座教授，講授印度史。接着美國約翰·哈金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等校相繼聘請他任教。這樣他在美國總算站穩了腳根，取得了一個合法的大學教授身份。

正是利用這個身份，他在美國許多地方發表演說，用雄辯的事實向美國人民介紹中國內戰的真相。他流利的英語、精闢的論證，給許多聽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期間

周恩來的信賴

他還寫了不少揭露文章，其中一九四六年十月在《遠東概覽》雜誌上發表的《中國官僚資本與內戰》，在海外讀者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他在華盛頓呆了一段時間後便東赴紐約，執行周恩來的指示。當時有關方面還派唐明照等協助陳翰笙在美開展工作。

在紐約，經美共方面的安排，他終於在一家賓館見到了美國共產黨主席福斯特，從而建立了中共和美共的聯繫。福斯特給陳翰笙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這個工人出身、著述豐碩的美共領袖熱情、沉着、勤奮、堅定而又敏銳。

他們就中美兩黨的合作、國際工人運動的形勢、殖民地世界的革命等重大問題廣泛地交換了意見，談得很融洽。此後中共同美共一直保持著聯繫。

陳翰笙在美國很活躍，他廣交各層次的朋友，所以，當需要了解什麼情況或處理什麼急事時，他只要出去走上一兩遭或通幾個電話，就可以把事情辦成功。

在美國，他除了同美共接觸外，還團結各方面的進步人士。馮玉祥就是他團結的一個對象。他利用《華僑日報》的陣地大力支持馮玉祥在美國開展政治活動。陳翰笙還請馮玉祥夫婦吃飯，做他們的思想工作。馮玉祥喜歡陳翰笙的率直、坦誠和敏銳，親筆畫了一隻雄雞贈他，意在呼喚黎明。此外他還寫了一副對聯送給陳翰笙。馮玉祥和陳翰笙早在三十年代就認識，而在美國進一步結下的友誼，給

田 森

彼此都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旅美期間，陳翰笙做了大量介紹中國的宣傳工作，爲中共贏得了同情和朋友，在團結海內外人士方面表現出色。

陳翰笙後來奉命回國後，周恩來一次會親自對陳翰笙講了這樣一番話：

「我們從各方面對你做了調查，大家對你的印象都很好。這說明你是一位好同志。」對於周恩來的這個評價，他是當之無愧的。

（《百齡書宿陳翰笙》之二十三）



陳翰笙從海外回到祖國後，百忙中擠出時間專門去探望了李任潮。

李任潮是李濟深的字。

當時，李任潮已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

陳翰笙見到李濟深後立即拱手連稱：「任潮，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特來登門致謝！」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進攻香港。香港危在旦夕，陳翰笙送走了宋慶齡後，留下來處理「工合」的善後事宜。一九四二年二月香港淪陷後，他化裝乘坐去澳門的難民船逃出香港，後幾經周折，轉到廣西、桂林。

在桂林，陳翰笙的公開身份是廣西桂林師範學院西文系主任。他除了繼續從事地下工作外，還指導當時仍在桂林出版的由他在一九三四年創辦的《中國農村》月刊，這個刊物在輿論上配合了國內的土地革命，在當時頗有些影響。

然而有兩件事情卻又惹怒了重慶當局。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七日，陳翰笙在桂林召開了紀念蘇聯十月革命二十六周年大會，並邀請了當時英國駐廣東廣西總領事到

會，就英國反法西斯主義運動發表講話。此舉使國民黨當局頗為惱火。此外陳翰笙還利用他的社會影響，在桂林招待外國記者，宣佈廖承志被蔣介石秘密逮捕。這消息經外國記者披露後，輿論為之譁然。當時正是國共兩黨聯合抗日的時期，國民黨扣押共產黨要人在輿論上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外國記者剛一發佈這一消息，宋慶齡立即出面要人，國民黨極為被動，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只好偷偷放人。

恩人李濟深

田森

廖承志獲釋後，何香凝對陳翰笙萬般感謝，連夜作畫贈陳，以畫中的梅花來傳遞她的深情。何香凝的這幅畫至今還珍藏陳翰笙的家裡。

陳翰笙在桂林做的這兩件事情使蔣介石頗為不悅。他曾經想用封官許願的辦法來收買陳翰笙，後又試圖威脅，可陳翰笙軟硬不吃始終不肯就範。

於是一九四四年三月，一份加急密電到了李濟深的手裡；命令桂林方面把陳翰笙火速緝拿，押解赴渝。當時李濟深是國

民黨軍事委員會駐桂林辦事廳的廳長。

其時五十八歲的李濟深廳長曾經任過黃埔軍校的副校長，飽經風霜。抗戰爆發後，他支持中共抗日主張，是一個身在曹營心在漢的人物，更何況他對比他年輕十一歲的陳翰笙素來十分敬重，他怎忍心讓他被慘害呢？

「必須立即把這個絕密的消息告訴陳翰笙，要他趕緊逃走。」李濟深迅速地做出了決定。

第二天，陳此生受李濟深之託，邀陳

翰笙去他家便餐，飯前將重慶密電的內容告訴了陳翰笙，要他設法立即離開桂林，越快越好。

這消息雖說來得突然，但久經地下工作考驗的陳翰笙顯得和往常一樣地平靜。他立即燒毀了一些文件，很快就啟程赴昆明了。

抵昆明後，他又在英國友人的幫助下，搭乘為他準備的一架英國皇家空軍的小型軍用飛機。一登機發現機倉裡連個座位也沒有，陳翰笙同他的夫人就坐在機艙的

地板上。由昆明巡飛加爾各答。飛機迅速地抵達了目的地。印度朋友熱烈地歡迎陳翰笙的到來。

印度，這個具有光輝燦爛文化的佛教大國一下子便吸引了這位流亡的學者，他對印度歷史和經濟發生了濃厚的興趣。為進一步了解這個國家，他甚至在已年屆四十七歲之時開始學習印度語。

從加爾各答到新德里不久，他就在德里大學找到了一個評卷員的工作，同時又在遠東情報局編寫新聞稿和電台宣傳稿。他還利用一切時間研究印度歷史，成為我國著名的印度史專家。與此同時，陳翰笙還訪問了印度很多地方，對印度經濟區域的劃分問題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並為他後來寫成《東亞農業區域》的專著奠定了基礎。

不消說，陳翰笙能有機會到印度去考察，能有機會化險為夷，這同李濟深於危難時刻相救有直接關係。飲水思源，難怪他念念不忘自己的救命恩人。

李濟深一九五九年逝世後，陳翰笙專門寫了題為《懷念李任潮先生》的紀念文章，借以寄託他對李老深深的哀思。



直到生命的最後時期，宋慶齡依然保留了遇事同陳翰笙商量的習慣。一九八一年三月，即在她逝世前兩個月，宋慶齡還給陳翰笙寫信就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授予她榮譽法學博士學位的答辭內容一事同他商量，陳翰笙接到來信的第二天就回覆了她。

我因為知道陳翰笙是宋慶齡的親密朋友，交往頻繁，所以曾向陳翰笙提過四個問題：（一）在你看來，什麼是宋慶齡政治上的顯著特點？（二）什麼又是她生活上的特點？（三）什麼是她的工作作風？（四）她最喜歡什麼人？陳翰笙幾乎是不假思索地一一做了回答。

對於第一個提問，他以四個字作答：「崇尚民主」，看來，

這是陳翰笙的一貫的看法。一九八

一年宋慶齡

去世後，陳翰笙在他一篇題為《為民主而英勇戰鬥》的紀念文章中，用另一種方式強調了這個觀點，陳翰笙寫道：「宋慶齡是一位英勇的民主鬥士。我們要向她的傑出的模範行動學習，因為我們要繼續加強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

陳翰笙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更為簡煉，只用了兩個字，「儉樸」，當他發現我向他投去了不解的目光時，他很自然地又做了一番說明：

「獻身革命事業的宋慶齡的生活極為儉樸，這是外面不少人所不知道的，也是有些人有意中傷她的一件事。其實，她平素在家吃、穿都很簡單。她穿的衣服更是樸素，有些已經很舊了。你不能光看她在公開場合露面時的穿着，那是禮儀上的需要。她給熟朋友

宋慶齡的風格

寫信時，往往將舊信封套翻過來再用，養成儉樸的習慣是一種美德，縱然在將來物質豐富的時候，我們也應當如此。在這方面，宋慶齡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好榜樣。」

對第三個提問的回答是「從不拖拉」。他舉了他們之間來往信件的情況說明這個作風。他們之間書信來往是相當頻繁的，可沒有一封信不在三天內就作答。不僅對他如此，對其他人也是一樣的。

至於她喜歡什麼人，答案也是簡煉的：「有氣節的人。」說罷，他又主動地給我做了一點解釋。

「你知道她為什麼那麼推崇為她工作了多年的老保姆李媽嗎？宋慶齡把李媽尊稱為李姐，有時甚至用「親愛的李姐」，那是因為他們一起生活了五十三年，即使在白色恐怖極為嚴重的歲月，李燕娥對宋慶齡

田森

們報告與宋慶齡來往人士的姓名。一個沒有文化的婦女能做到這點很不容易，這說明李燕娥是一個「有氣節的人」。所以，在李燕娥病危的時候，她保證她將來一定要同李姐葬在一起。她是這樣說的，最後也是這樣做的，由此你也可以看到，她是多麼熱愛一個有氣節的人啊！」

當時聽完陳翰笙的這一番解釋，一個念頭驀地掠過我的腦際，它彷彿令我茅塞頓開，使我也明白了為什麼宋慶齡那麼喜歡、信任陳翰笙的原因，因為他也是一個難得的「有氣節的人」。更何況他才華橫溢、思維敏捷，對宋慶齡在事業上頗多幫助呢。



一九五六年二月初，陳翰笙隨宋慶齡出訪歸來後，接着又是一系列的外事活動，待他隨彭真訪問蘇聯等六國歸來後，已是一九五七年二月，不久反右派鬥爭的序幕就拉開了。神州風雲突變，令長期在海外工作的陳翰笙難以理解，特別是看到一些他熱識的友人被打成右派，素來愛講真話的陳翰笙怎麼也按捺不住內心的不平，於是在一次會議上直言買禍。當時他責問：「有右必有左，這是常識。正如有右手必有左手。既然右派該反，那麼左派也應當反。右派不好，那麼難道左派就好嗎？」儘管他是特指加引號的「左派」，但是眼看厄運很快就要降臨到他的頭上。形勢對他極為不利，陳翰笙對此卻泰然處之。陳翰笙要被打成右派的消息，很快地傳到宋慶齡處。素來了解陳翰笙的宋慶齡挺身而出，用明白無誤的語言說：「陳翰笙絕不是右派。」為此，她找到了周總理。周總理當即對有關方面作了工作。宋

宋慶齡力保陳翰笙

田 森

友重逢，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若干年後，史無前例的文革風暴席捲了全國，宋慶齡和陳翰笙之間縱然在白色恐怖時期都從未中斷過的聯繫被迫中止了。後來，宋慶齡得到了一個壞消息，說陳翰笙已被打成了CC分子，這時候她再也忍不住內心的憤怒。她深知陳翰笙多少年來出生入死，為人民做了大量貢獻，為世界進步人士所尊重，怎麼能如此顛倒黑白，把他說成是CC分子呢？宋慶齡想方設法找到了陳翰笙的下落，不畏四人幫的權勢，給陳翰笙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親筆信，並且還給他寄去了一些可供閱讀的材料。在那個人們都遠離陳翰笙的時刻，宋慶齡卻向他送去了信任和關懷。這既是對四人幫的抗議，又是對友誼的忠誠。

一九七一年，陳翰笙終於被解放了，他從湖南茶陵回到了北京，他同宋慶齡又見面了。這時他倆都老了，宋慶齡已是七十八歲，陳翰笙也七十四歲了。老友重逢，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一九七一年，不論對陳翰笙，還是對中國說來，都是不尋常的一年。雖說是「四害」依然橫行，神州的天空還沒有晴朗，但陳翰笙畢竟又回到了北京，林彪墮機身亡，聯合國又恢復了中國合法地位。事態是向着好的方向發展。

這一段時期，他們見面的機會增多了，來往的信件就更頻繁了。

特別是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訪華後，宋慶齡的外事活動逐漸多了起來，而陳翰笙也在他住的東華門三十八號的寓所內辦起了英語學習班，幫助年輕人學習外語，掌握知識，以便來日為祖國的四化貢獻力量。

宋慶齡的擔保使得陳翰笙倖免於淪為右派，然而他在《中國建設》的領導地位畢竟受到了動搖，從此他在《中國建設》中不過處在一種掛名的地位上罷了。



歲月匆匆，陳翰笙於一九四一年底與宋慶齡在香港一別，又經歷了整整十個寒暑才在北京重逢，那是一九五一年三月。

剛回國的陳翰笙在一種清新的春的氣息的伴隨下，應邀來到宋慶齡在北京方中巷的住宅。

次見到周總理。

當時建國不久，中國迫切需要外國正確地了解中國，於是周總理同宋慶齡商量，希望能由她出面辦一家對外宣傳刊物。宋慶齡表示贊同，並建議由陳翰笙來主持編務。這就是為什麼宋慶齡宴請陳翰笙，周總理也來參加的原因。

席間，周總理親自同陳翰笙談了辦對外宣傳刊物《中國建設》的事。他接受了這個任務，經過近一年的緊張籌備，終於在一九五二年初創刊。創始人爲宋慶齡。第一屆的編委會成員有金仲華、陳翰笙、錢端升、李德全、劉鴻生、吳貽芳和吳耀宗，都是各界知名人士，愛潑斯坦被任命爲執行編輯。

《中國建設》問世後，立即引起了海外人士的關注。

宋慶齡的工作作風歷來極爲嚴謹，作爲刊物的創始人，她不僅要過問刊物的方針政策，看重要的文章，甚至連一些答覆外國讀者的重要信件，也要親自過目，字斟句酌。

爲了把《中國建設》辦得有聲有色，陳翰笙全身心地投入到編輯工作中去，幾乎每一篇重要文章他都親自改過，有的還不止一遍。

爲了讓《中國建設》在國外讀者中取得更大的宣傳效果，陳

翰笙力主刊物要少以官方的面孔出現，少發那些措詞生硬、板着面孔教訓人的文章。他的這個意見在當時頗遭到有些人的非議，但是宋慶齡非常贊同陳翰笙的這一意見。

當時中國還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社會，一般的外國人很難了解中國，爲此，陳翰笙非常重視同外國讀者的交往，對於普通的讀者來信極爲關注，不少重要的讀者來信都是他親自回覆的。他的這種作風很受宋慶齡的讚許。陳翰笙對於國內一些刊物編輯不給讀者覆信的作風是極不滿的。他曾不止一次同我談到，宋慶齡這樣一個大人物，覆信之快是驚人的，這也體現了對寫信人的一種必要的尊重和平等觀念。

壽創主編《中國建設》

田 森

一九五五年，宋慶齡應印度總理尼赫魯的邀請，對印度進行正式訪問，隨行的有廖承志、陳翰笙等十餘人。尼赫魯對宋慶齡十分敬重，特意安排她住在他的官邸。宋慶齡當即提出要陳翰笙夫婦也同她住在一起。宋慶齡住在樓下，陳翰笙夫婦住在樓上，其他代表團成員則另住賓館。這樣，尼赫魯一家同宋慶齡及陳翰笙夫婦每天都在一起共進餐飲。他們邊吃邊談，氣氛融洽。有時還漫步草坪縱論世界，尼赫魯對孫中山極爲崇敬，間或亦討論孫中山思想。

宋慶齡在處理對外關係方面非常能幹，她不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也是位出色的外交家。陳翰笙能夠在宋慶齡的國事訪問中爲她擔任隨身邊顧問，這種信賴又怎能不給他留下了難忘的回憶呢？在尼赫魯官邸居住的日子裡，陳翰笙給尼赫魯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赫魯還邀請陳翰笙出任德里大學客座教授，分手時又以打字機相贈，因爲那是印度造的，他很想給陳翰笙留下一個紀念。



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裡，陳翰笙和宋慶齡之間的書信來往一直都未中斷過。直到今日，陳翰笙的書櫃裡還珍藏着宋慶齡寫給他的上百封親筆信，而令他永遠抱憾的是比這更多的手書在十年浩劫中丟失了。他們之間長達半個世紀的誠摯而又高尚的情誼在現代人類的友誼史上堪稱佳話。他們是同志加姐弟。宋慶齡曾對陳翰笙胞妹素雅親口說過：「我把翰笙當做自己的弟弟。」

從一九三三年他們分手到這次重逢，一晃就是六年。香港重逢，給宋慶齡帶來的喜悅是不言而喻的，難怪她辭辛勞親赴碼頭迎接陳翰笙的歸來。她對陳翰笙說：

「爲了堅持抗日持久戰，需要工業的支持，我和幾位外國朋友商量，準備搞工業合作運動。斯諾、艾黎、史沫特萊這些支持中國人民抗戰的忠實朋友搞工合的熱情都很高，大家都在期待你回來幫忙哩！」

宋慶齡那充滿希望的微笑也傳染了陳翰笙，他愉快而又肯定地說：

「我們會成功的！」

「工合」的旗幟一打出去，國民黨爲了表示自己抗日也不得不表示支持。在艾黎的要求下，孔祥熙只好撥了幾十萬元，做爲工合總社的開辦費。「工合」就這樣辦了起來。當時國外的捐款很多，國民黨把總會收到的大部分捐款都撥給了國統區。爲了扭轉這種局面，艾黎主張在香港籌組工業合作國際委員會，由宋慶齡任名譽主席，香港英

宋慶齡的得力助手

國主教何明華任主席。陳翰笙被任命爲「工合」國際委員會的執行秘書。這樣國外來的捐款就可以保證送到堅持抗戰的解放區去。同時國際委員會也幫助解放區發展自己的工業合作運動。在近三年時間裡，陳翰笙協助宋慶齡對解放區的抗日鬥爭給予了很大的支持。

在二年半的時間，設立在香港的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共籌募到捐款二千多萬元。

每次籌募到錢，陳翰笙總是盡快地通過廖承志的渠道送往延安，當時延安方面負責與「工合」聯絡的是李富春，他一收到募款後，總是親自開具收條。所以當時對陳翰

笙說來，再沒有比收到李富春的親筆收條更令他欣慰了。

在那些日子裡，精力過人的陳翰笙除了負責「工合」國際委員會的日常工作外，還負責主編一本英文半月刊《遠東通訊》。它的宗旨是向廣大海外人士介紹八路軍、新四軍，爭取人們的同情和支持，對當時國外各界人士在國民黨封鎖新聞的條件下了解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起了很好的作用。

「皖南事變」爆發後，國民黨更是千方百計地封鎖有關這一重大事件的消息。當時陳毅曾派沈其震專程赴港向宋慶齡介紹情況。

陳翰笙在了解了全部情況後，主張立即向海外報道，

用最快的速度出版了載有由他撰寫的披露「皖南事變」真相文章的《遠東通訊》，頓時舉世震動。這是最早向外界報道「皖南事變」的刊物，難怪美國國務院對這家刊物越來越重視，把它作爲檔案保留起來。那時，陳翰笙不僅忙於用筆來對付反動派，而且使出渾身解數在極短的時間內募集大批新四軍急需的各種物資，火速運往新四軍駐地，以支援他們的重建工作。

在宋慶齡的領導下，香港的抗日救國工作做得有聲有色，對國民黨顯然極爲不利，於是重慶當局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想出了一個借助洋人的影響對宋慶齡施加壓力的辦法：要她去重慶，以此限制她的活動和影響。他們再三請來英國駐重慶大使專程赴港勸員宋慶齡赴渝定居。

田 森

宋慶齡先生大義凜然，歷數蔣介石政府種種劣蹟，指出她無法和一個反人民的政府合作。當時在座的陳翰笙亦嚴詞指責蔣介石的反共政策，完全違背了孫中山的教導，代表不了人民利益，怎能讓孫夫人去同這樣一個政府合作呢？英國大使游說不成，只好灰溜溜走了。

據艾黎生前對我說，「宋慶齡非常信賴陳翰笙，經常就各種重大問題徵詢他的意見」。愛潑斯坦先生也告訴我，「宋慶齡非常尊敬陳翰笙，喜歡聽取他對各種問題的分析和判斷」。陳翰笙的確是宋慶齡身邊一位重要的智囊人物。



一九三九年五月的一天，在由紐約駛往香港的一艘外國輪船上，一對中年夫婦倚着船欄，極目前方，輪船划破層層波浪，緩慢地前進着。船駛抵香港後，他們從容不迫地上了碼頭。

剛走到碼頭的出口處，只見一位端莊而又美麗的夫人向他們走來，熱情地對他們說：

「翰笙，你們辛苦了！」

陳翰笙放下手中的提包，緊緊地握住她的手，似乎好多要說的話都凝聚在他那強勁的一握中了。陳翰笙的心情的確非常激動，他知道這位老朋友能夠懂得他那無聲的語言。倒是站在他身邊的妻子顧淑型高興地說道：

「夫人，多年不見，你還是那樣年輕。」

這位專程來迎接陳翰笙夫婦抵港的中年婦女正是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女士，陪同孫夫人前來迎接陳翰笙的還有愛潑斯坦等人。

早在一九二七年，陳翰笙在莫斯科就通過鄧演達的介紹與宋慶齡相識了，改造

舊中國的共同理想把他們連結在一起。初次在異邦相逢，兩人談話雖然不多，但都有一種「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感覺。

一九二八年，陳翰笙奉命回國，在商務印書館做編輯和中央研究院工作時，他經常去上海莫里哀路宋公館，同宋慶齡的往來頗頻繁。那時出於安全的考慮，革命者的交往每每採取單線聯繫的形式，即使是同被稱之為「國母」的宋慶齡的接觸也是如此。一次宋慶齡前腳剛送走了楊杏佛，後腳便進來了陳翰笙，當時陳翰笙親眼

半個世紀的友誼

田 森

看到楊杏佛離去的背影，而且宋、楊、陳三個人彼此都是好朋友，楊、陳又都住在上海霞飛路，兩宅相對，兩人不僅經常相見，而且交談頗多，可他們三個人誰也不談起這次相遇，彷彿不會發生過此事一般。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國民黨左派著名人物鄧演達被蔣介石殺害，宋慶齡悲憤之至，當即奮筆疾書，寫了著名的抗議書，並請陳翰笙親交《申報》領導人史量才。鑒

於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日益獨裁，進步人士的人身安全，人民群眾的言論結社自由受到越來越嚴重的威脅，宋慶齡決定在上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並親任主席。她對陳翰笙說：「為了便於秘密參加同盟的各項重要工作，你不要公開加入同盟。」那時，如營救牛蘭夫婦，護送危險人物離滬，傳遞重要信息，起草有關文稿的重任便都落在了陳翰笙的身上。

同盟建立不到一年半，就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令蔣介石極為不悅。他決

計要給宋慶齡一點顏色看，於是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派人暗殺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總幹事楊杏佛。這次事件激起陳翰笙極大的義憤，加之傅斯年又對陳翰笙主持的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工作大加干涉，使研究工作很難開展。陳翰笙憤然辭去研究所的領導職務，決心深入到中國基層去搞農村調查工作。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宋慶齡，她當即表示贊同，並向他伸出了援助的手。她給友人寫了一封親筆信，把

它交給了陳翰笙，懷着深深惜別的心情說：

「翰笙，你拿着我給你的這封信到廣州去找唐紹儀，他會幫助你的。」

就這樣陳翰笙懷着悲憤難平的心情離開了上海，直奔廣東。

唐紹儀這位曾經做過內閣總理的政要人物，當時是廣東中山模範縣的縣長。當他看到宋慶齡熱情洋溢的推薦信時，十分親切地接見了這位來自黃浦江的新朋友，並設盛宴為他洗塵。

席間，陳翰笙提出要在廣東中山等縣搞社會調查，唐紹儀欣然同意。由於有他的支持，陳翰笙被任命為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員，他的調查工作進行得很順利。作為這次調查研究的成果，他寫了《廣東農村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一九三四年於上海出版。後來由於國內形勢繼續惡化，加之左爾格通過史沫特萊又一次邀請他去日本，一九三四年冬天，陳翰笙遂以廣東中山文化館研究員的身份東渡日本，以在東京東洋文庫研究中國經濟史為名，繼續為共產國際工作。



一九二〇年秋天，陳翰笙懷着求知的渴望，對生活的喜悅和信心，進入了美國著名的芝加哥大學研究院。

他以過人的聰慧和勤奮，僅用了一年時間就修完了所有碩士課程並完成了題為《茶葉出口與中國內地商業的發展》的碩士論文，順利地獲得了碩士學位。

一九二一年，對陳翰笙說來，是不平凡的一年，不僅因為在他頭上多了一頂碩士的銜頭，而更因為他在政治上變得比以前成熟多了。

在芝加哥大學，他結識了一些新中學會的會員，大大擴大了他的視野。新中學會是一個進步的政治團體，它的宗旨是革新中國的政治。在海外的新中學會會員每周都要聚會。大家痛感中國時政之腐敗，經常議論改革之方案。討論中，不少人慷慨激昂，聲淚俱下。會員們的愛國熱誠深深地打動了陳翰笙，他決心也要加入這個愛國者的行列。不久，他就由新中學會的領導人之一高仁山和另一位也在芝加哥大學學習的查良釗介紹，加入了新中學會，從而在他生命史上揭開了重要的一頁。

加入新中學會

呼號。中國留美同學組成了「中國留美同學會」，陳翰笙被推舉為秘書並負責主編《中國留學生季刊》，這個季刊在陳翰笙的主持下，成為反對軍閥賣國、革新政治的喉舌。

為了勸阻中國政府不要在喪權辱國的華盛頓會議達成的九國條約上簽字，中國留美同學會派出了包括陳翰笙在內的代表赴華盛頓，後來為了抗議他們的簽字，與陳翰笙同行的一位留學生代表還動手打了受北洋軍閥委託在賣國條約上簽字的一位官員。

這一時期，陳翰笙比過去更加勤奮地學習。當四周的一切都溶入濃重的夜色之中，他依然伏案苦讀，博覽群書，努力探索救國救民的道理。他渴望了解世界，特別渴望多了解一些革命後俄國的狀況，為此他甚至選修了別人不學的俄文，而且學得十分刻苦。當時他完全沒有料到，他在芝加哥大學學的這點俄文，在後來共產國際的工作中竟派上了大用場。

田 森

算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後來由於朋友的建議，他轉入了著名的柏林大學，出任東歐史地研究所的研究員。他一面工作，一面繼續學習，並花了不到兩年的時間用德文完成了題為《一九一一年瓜分阿爾巴尼亞的倫敦使節會議》的博士論文。他的論文深受柏林大學東歐史地研究所所長奧托·赫曲教授的好評，他被授予了博士學位。

陳翰笙在學術上的出色成就和品格為人，使他成為中國留學生中的一位風雲人物，很多人都知道他，很快他的名字也傳到了思賢若渴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的耳朵裡，他立即托人來看他，要他回國出任北京大學教授，其時他年僅二十七歲。

就這樣，陳翰笙結束了他在海外九年多的生活，帶着出眾的才學和更加執着的探索真理的精神踏上了回國的征途。

在返國途中，他倚着輪船的欄桿，任憑自己萬千思緒縱橫，望着那無邊無際翻滾的海浪，他的思潮也不斷起伏。他終於把自己的思緒凝聚到一點：

「爲了振興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我要獻出自己的一切。我要把在海外學到的知識用來培養人才，爲締造一個繁榮昌盛的新中國而奮鬥！」

此後，陳翰笙不只是埋頭於學術，而是對政治更加關心。他從對中國現狀的不滿，發展到爲改造舊中國而奔走。

一九二二年初，陳翰笙又進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深造，除了專攻歐洲史外，他沒有放棄繼續鑽研俄文。本來他打

肥袍？

頌葵

周瑜打黃蓋這色地編進《三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才使人不禁回想起來。

思，黃蓋爲了少或幾乎沒有場。不必說太包，小官向大多的是一——心裡罵娘，不笑臉送上還不行：扣留你兩天，損失更大。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走路，諸如此類「自願挨打」的黃蓋，爲公爲私的，你我他即使沒挨過，也聽被挨打者呻吟過。

得到的報告：他的淮鹽三手續；十大車茶葉、馬牙香小意思。他拜是用銀錢可以挨一周瑜一的周瑜。乍一讀似乎有理，再細想卻未必然。

爲什麼？如果以送禮爲標準，心甘情願「搬屁股挨打」的，是送禮的外商。他們的地位相當於倒爺西門慶；同樣是送禮，同樣是熱情招待，也許還同樣有性服務，目的同樣是因此得到好處。享受到這些好處的，能不是周瑜？之所以把關係顛倒，緣由只看見我方挨「宰」，卻忽略了此「宰」乃「黃蓋」被打屁股的必然成果，不是打屁股本身。

何況，即使「宰」，幾時「宰」到「周瑜」身上？「宰」的結果，大都是由公款負擔的「學費」。除了特別出格的個別外，了不得也只是通報批評之類，連撤職也未必能難得上。可見，即使「宰」也可以勉強稱作「打屁股」，那挨打的屁股，也是社會主義，是國家，是理應擁有這些財產的人民，一棍也不會打去到國外旅遊，提回大包小包「打龍袍」的周瑜。屁股上。萬一真有甚麼動作，了不得也是「打龍袍」。彭德懷用過一句俗話來形容這類敗家子：「崽賣爺田不心痛」，十分確切。他們幾時自願「搬屁股挨打」過？

即使僅僅是「打龍袍」，「周瑜」們仍然不很樂意。無他，屁股是公家的，龍袍可是自己的也。不時從報刊上聽聞，某某港口積壓了不少進口設備，硬是沒人認領。這當中，固然有「馬大哈」，更不乏耽心認領之後得挨「打龍袍」的主。「自願挨打」云云，恐怕是過高估計那些假黃蓋、真周瑜了。

。在校學習期間，一個偶然的機會把他帶進了長沙基督教青年會的講演廳，那時美國科學家羅伯特正以極其生動的方式向聽眾介紹美國果樹專家路斯·波潘克的神奇嫁接術，少年陳翰笙的心再一次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不僅聽出了神，而且浮想連翩。他想，如果自己也學會這種嫁接術，豈不是對我國發達農業大有好處嗎？農業發達了，科學發展了，國家也就必然會往前走的。科學進步了，政治不刷新也不行。他突然覺得這才是他應當尋求的救國救民的道路。此刻一種科學救國的念頭

大陸公開
妙字趣語

指出漢
弊者，可
數；我所

超過一百篇（語言文字
未算在內），段先生農指
化三大惡果的一篇，不
收錄在《文字與文化》
其中的一篇而已。不必
其他同類文章，也該想
陸各異人士對簡化的反
？但是，介紹這套叢
主編袁曉園教授有關「
寫簡」的主張，那是有
要的。

袁曉園教授，今年
七歲（比周有光先生年
歲）。她是資深的語言
學家，一九八五年自美
國後，為迎接文字改革
階段，創辦了漢字現代
字會，任會長（香港資
字學家安子介先生是該
段先生指出簡化有三

陳翰笙百年軼事

編者按：陳翰笙先生（一八九七——）是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國際問題專家。江蘇無錫人，先後就讀於美國波莫納大學、芝加哥大學研究院、哈佛大學研究院，獲柏林大學博士。一九二八年，主持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農村經濟調查。一九三五年在香港編輯英文半月刊《遠東通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外交部顧問、中國外交學會副會長等職，編著有《工業資本與中國農民》、《華工出國史料匯篇》等書。

少年立志 科學救國

陳翰笙於一八九七年二月五日出生在江蘇無錫一個知識分子的
家庭裡。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曾做過教師，其父還曾做過小官，爲了
謀生經常在外漂泊，所以母親對他的影響特別大。母親出身在大戶
人家，性格剛強豪爽而重志氣，從小就經常給陳翰笙講做人的道理，諸如「人窮
心要鋼」、「寧喝開眉粥，不吃愁眉飯」、「不可見大佛拜，見小佛踢」、「做
天不可令諸人遠避」、「有理堂前打太公」、「不聽好人行，終吃苦黃連」等等。
那意思無非是告誡陳翰笙要做一個有志氣的人，凡事要靠自己，爲人要正直，
不可做勢利眼，要敢於堅持真理，要聽得進別人的勸告。母親的淳淳教誨對陳

流中去，他當時甚至不想再讀書了，整天忙着幫助鬧革命的老師發送報紙，打聽消息，忙得不亦樂乎。那一段緊張而又興奮的生活給他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一九一二年，根據父親的意見，陳翰笙考入長沙雅禮學校



到了時政的黑暗，呼喚青少年們要為美好的明天而奮鬥。他指出每一個熱血的中國青少年爲了振興中華，必須反滿反帝，捨此而外別無他途。陳翰笙的言被這位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的呼喚深深震撼。黃興的報告在這個當時只有十四歲的少年心中播下了拯救中華、救國救民的種籽。這是陳翰笙心中的第一次震撼。「在未來的歲月裡，我能做點什麼呢？」一個嚴肅的問題提到了他的面前。

目睹中國政治的



屋 (木色套)

大公園

紫雅在一起回憶時，不禁老淚縱橫，此亦可見母子之深。很多年前，爲過一首悼念亡詩，就中有一見爲擔鐵肩」之句是說他從來沒有親的遺訓。

做人。從那時到現在，九十個春秋過去了，可老師的教導依然縈繞在他的耳際。一次，他不無激動地向我講述了當年老師如何教育他做一個誠實的孩子，勸他不要上茶座，走路不要東張西望，入明德中學學習。在這裡，他遇見了一位留學日本的歷史老師傅熊湘。傅老師爲人耿直，頗具革命思想。他對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極爲不滿，多次在課堂上痛斥曾國藩的卑鄙無恥。陳

，一個民族敗壞，他怎麼也抑制不了心對曾國藩的仇視。於是找出一張紙，真地畫了一張敗壞國藩腦袋的圖畫，以發洩他對這個敗類的仇恨。

在明德中學

腐敗，他想尋求自己力所能及的救國救民的道路。當時他想，要救國就必須刷新政治，就像黃興在報告中所說的那樣。可對他這樣一個少年說來，要想能為刷新政治做一番事業，當務之急就在於學好本領，特別是應當學習外國先進的東西，借以來的推翻滿清，振興中華。那一年正好清華學堂招生，十四歲的陳翰笙便赴京趕考，以求深造，可惜這次考

蓓 鮑

(亥)

見我是如

他五歲隨父親入東林小學，品學優良，深受喜愛。小學中兩師黃淡如、顧倬這個如飢似渴的孩子非常關注，不僅教他知識，告訴他應當怎樣西望，為人處事一定要正直、真誠。當他回憶這兩位老師的淳淳教導時，無數往事浮上他的心頭。我看得出一種感激的表情掠過他的臉龐。

一九一〇年，陳翰笙隨父母來到長沙

翰笙看着老師那憤怒的表情，一個堅定的信念從他心底升起：一曾國藩是個壞家伙

的歲月裡，有一令他終生難忘的是聽黃興的報告，興的報告有力地

日本數家出版了出了指書
社出版的百科全書
因對同性戀所下的詮釋「引導讀者採取誤解」而受到

見我是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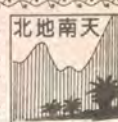
抗議後，都表示會作出「積極的答覆」

張散

試他失敗了。待他回到湖南後，辛亥革命已經爆發，陳翰笙很快就被捲入革命的洪流。

在有關詞條中對同性戀作「親性」與「偏見性」的詮證，說明這類說法對同性戀一定的態度，容易助長（性戀的）歧視與偏見，強烈要求有關出版社那時修正。

北地南天



領城寺庵
如以詳的
其他佛等等，說
附近的雙林寺卻座
寺名雙林，五
釋迦牟尼圓寂之地

山西在南北朝時長期是北魏的主要領域，北魏崇尚佛教，所以山西各地的廟特別多。一般寺廟都有共通之處，以大雄寶殿為中心的建築群，耳熟能詳的釋迦牟尼像、羅漢像、天王像以及說真的，看多了難免生膩。但平遙城確實有獨特的價值。

不知來歷頗為難解。原來佛經記載，也在古天竺跋提河畔沙羅雙樹之間，製作為單膝，姿勢之靜與汪水族護持和嘴形，佛真有一工匠既刻的體會

愛亂指

議前十天不提，馬上就要討論，於是美國總統密特朗評爲「好像由宇宙飛來的O（未確認飛行物體）」。

此語一發，頓只好將提案撤回。

第二件則是美元下跌問題。多方認爲，首腦會議正好商量如何支持美元，但是頓發言說，市場反應過於敏感，在美國，這是一件小事，不用干涉市場。結果美元更加下跌，到了最近，已經是九十圓就可以換一美元，這是克林頓發言後接反應。

美國輿論對克林頓的支持本已不足百分之十。有了這兩件事，可能再下一層樓。

述三部百科「事典」提出抗議，而遭到廣泛的詬難。」

日本一個同性戀者團體就上

何

孤

責者誠！

及小學館都接受了抗議，因此自己「知識不足而招致誤解」，並都明確表示要「或修訂上述詞條。至於學，同樣表示會作出「積極」。

日本這一稱不上事件的「事件」，本身並沒有什麼了，但卻啓世世人：對任別亂指責，凡事都應先行才是。

五七一年，既云從北齊計算起，燹風霜，元末時重修、重建，現雙林寺可貴佛像所表現出來，大抵都是明塑家）繼承了唐代創新。除了在手法之外，在動作表其中兩尊觀音像

重修，則始建年代必較此爲早。即使至今也有一千四百多年。經過歷代兵已傾圮不堪。明、清兩代都有大規模在所見大抵爲明清建築。

的不在它的宗教性質，而在寺內各種高超的彩塑藝術。二千多尊大小佛像，可以看到當時的工匠（民間藝術，以彩色塑的優秀傳統而又有所發展和法和設色方面都趨於寫實，更覺眞人，情上突出了獨特的性格，十分傳神。造詣之高，使人歎爲觀止。

兩腿成，支撐身體。整個塑了許多工適的姿勢者心目中嚴肅穆的「古代理代中外均如術。



一九二五年，由美英等國一些著名的活動家和學者發起組織了「太平洋學會」，旨在促進太平洋國家間的友好聯繫。美、英、法、日、蘇、印、新西蘭等國均有學術團體和個人參加。學會領導人是美國人愛德華·卡特，學會秘書處設在紐約。太平洋地區各國有影響人士對這一學會非常重視，它對增進這一地區人民的相互了解的確起了很好的作用。

一九三六年，學會決定出版自己的機關刊物，定名為《太平洋事務》，由美國著名學者、曾榮獲英皇家學會金質獎章並對白宮具有影響的拉鐵摩爾任主編。

拉鐵摩爾需要有力得力的、思想進步的人幫助他來辦好這個重要刊物，他向作為會員國的蘇聯求援。蘇聯便推舉當時在莫斯科東方大學任教的陳翰笙前往任職。在這前不久，即一九三五年底，根據當時革命工作的需要，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康生經手將陳翰笙的關係轉入中國共產黨，不過他的身份一直是保密的。

拉鐵摩爾對中國素有興趣，曾到過中國，能操漢語，且著有中國問題專著，對中國情況熟悉。他早就知道陳翰笙的大名，聽說他要來幫他編刊物，不勝欣喜，他

當即以太平洋學會名義發出請陳翰笙出任《太平洋事務》副主編的聘書，並催促他早日啓程。不久，陳翰笙便取道法國赴美上任了。

拉鐵摩爾熱烈地歡迎他的到來，他們對如何辦好這個刊物很快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見。陳翰笙除負責撰文、編務外，還要擔負相當多的交際活動。當時赫赫有名的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訪美時，《太平洋事務》雜誌就曾出面設宴歡迎過他。作為這家雜誌的主要編輯，他還要負責同各分會的

出任《太平洋事務》雜誌副主編

田森

露國民黨政府的內幕、擴大國際統一戰線都發揮了強有力的作用。

在此期間，他還十分注意結交世界上一切同情中國革命和支持抗日戰爭的朋友，他同斯諾夫婦的友誼就是在那時建立的。在太平洋學會內，他以自己卓越的能力和誠懇的待人而結交了不少世界各國的著名學者。為了做好每年一度的太平洋學會成員國會議的準備工作，他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來研究、掌握成員國的最新政治、經濟、科學教育文化的動態。淵博的國際知

作者們保持經常的聯繫。他身在美國，胸懷整個太平洋地區，當然更念念不忘祖國，他要盡量利用這一陣地為中國革命和抗日戰爭製造輿論。斯諾的《西行漫記》剛一出書，陳翰笙就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出版的《太平洋事務》發表了這部著作的重要片段，當時就產生了很好的效果。陳翰笙本人在《太平洋事務》雜誌上也發表不少文章。其中《論日本侵略戰爭的內在原因》、《評南京政府的內蒙政策》等文章都以其尖銳的內容、犀利的文筆引起海外廣大讀者的注意，對宣傳中國抗日戰爭、揭

識和出色的外語能力為陳翰笙做好太平洋地區國際統一戰線工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一九三八年，太平洋學會加拿大分會出於對陳翰笙的崇敬和對中國形勢的關注，特地邀請他赴加拿大就西安事變的真相發表演說。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裡，陳翰笙的足跡幾乎走遍了加拿大的所有大城市。他用大量令人信服的事實雄辯地揭露了西安事變的真相和中國人民抗戰的決心。他的演講充滿了愛國的激情和深刻的道理，給聽眾留下深刻的印象。加拿大宣傳活動的巨大成功，再一次顯示了陳翰笙在國際交

往中的才幹。他同外國人打交道立場堅定而不生硬，據理力爭而又綿裡藏針。難怪時至今日，不少了解陳翰笙的外國人仍以極為崇敬的口吻談起他。

從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他在《太平洋事務》編了三年的刊物，成績卓著，為世人所公認。

七十年代初，在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開始解凍之後，拉鐵摩爾這位年高德劭、在美國政治舞台上頗有影響的大學者應邀再一次訪華，一抵北京他即希望盡早見到老友陳翰笙。兩位闊別多年而又年邁的異國老友，重逢一起，暢叙別情，感慨之多，自不待言。

由於三十年代同太平洋學會的這段密切關係，事過約半個世紀後，一九八五年，陳翰笙又一次在中國被推舉為中國太平洋歷史學會副會長，其時他已是八十八歲的老人了。他不僅親自過問學會的重要工作，而且不顧酷暑親赴山東省參加中國太平洋歷史學會舉辦的學術討論會，並且在會上對如何加強太平洋研究發表了許多中肯的見解，受到與會者的高度評價。於陳翰笙說來，還有甚麼能比幫助年輕人盡快地健康成長更幸福的事呢？



輪船駛抵海參威後，共產國際已有
人在碼頭等候陳翰笙他們了。至於說入
境的手續，早在他們離滬之前，幹練的
史沫特萊就在蘇聯駐滬領事館爲他們辦
妥了。

事後證明，史沫特萊果斷地將陳翰笙藏在艾黎家，是完全正確的。因爲就在陳翰笙那天剛離開新亞旅館不久，國民黨的特務就去新亞旅館搜捕人了。

多少年來，陳翰笙一直十分懷念他同史沫特萊的深厚友情。一九三七年史沫特萊到了延安，她寫了大量介紹中國革命和抗戰的文章，沒有任何一個外國記者曾寫過如此之多介紹中國的作品。後來她因病回國，即使在她各方面處境都極爲困難的條件下，她仍努力宣傳和介紹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當時陳翰笙曾經不斷地爲她提供寫作素材。新中國成立後，史沫特萊決心重返中國。一九五〇年春史沫特萊在抱病重返中國途中，因胃潰瘍復發，死於倫敦。在去世前的三天，即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她寫下了自己的遺囑，就中有這樣一段話：「埋在中國的土地上，將使我的心靈得到安

不朽的友誼

息。」這句話的含義是深刻的，這不僅因爲她早把自己的生命同中國革命聯繫在一起，而且因爲她這個非常重感情的人物在中國找到了諸如像陳翰笙這樣一些真誠而又值得信賴的朋友。她同陳翰笙之間交情之深，是鮮爲人所深知的。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三日，史沫特萊的骨灰盒運抵北京，由陳翰笙和曹禺等人親自將史沫特萊的骨灰盒護送到北京革命公墓，讓她安息在中國的大地上；安息在她信賴的中國朋友身邊；安息在爲中國革命獻出了生命的烈士中間。

田 森

至於當年護送陳翰笙夫婦上船的路易·艾黎一直生活在中國，晚年依然不斷地爲中國建設提出許多寶貴意見。

在他生命的最後三年裡，還同陳翰笙並肩領導「工會國際委員會」的工作，艾黎任主席，陳翰笙任副主席。他倆的友誼一直延續了半個多世紀。

陳翰笙和艾黎都是宋慶齡極爲信賴的朋友，在他倆的危難時刻，宋慶齡都會挺身而出，保護他們。直到一九八七年艾黎去世之前，陳翰笙仍常去探望這位與他同齡的戰友。



一九三五年四、五月間，當時在東京東洋文庫以做研究工作為掩護的陳翰笙，由於遲遲等不到早已約定在東京會晤的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約瑟夫·華爾頓，他預感到可能發生了什麼事，非常煩躁不安。他偶然在《字林西報》的英文報章上看到了華爾頓由於身上同時帶着三本護照，被以間諜嫌疑在中國上海逮捕的新聞。這消息來得太突然了，素來沉着的陳翰笙果斷決定馬上離開日本，他連家也沒有敢回，便直接坐船回上海了。

抵上海後，陳翰笙第一個念頭便是想去看望史沫特萊。

陳翰笙是在一九二九年春天在宋慶齡家中結識史沫特萊的。這位美國礦工的女兒從少年時代起就追求真理，節省一切開支，完成了大學學業，她思想敏銳，意志堅強，同陳翰笙幾乎是一見如故。多少年來一直到她臨終都同陳翰笙保持着深厚的情誼。她當時在上海的公開身份是德國《法蘭克福日報》駐華特派記者。那時她利用外國記者身份的便利條件經常為宋慶齡和左爾格傳遞信息。

看到經常思念的好友驚地從天而降，史沫特萊驚喜極了，然而她的心臟似乎又因驚恐在抽搐。她非常清楚，此刻形勢異常險惡，國民黨正在四處捕人，而陳翰笙正是他們尋找已久的重要對象。

「怎麼辦？自己這裡的目標也是比較引人注意的。為了安全計，還是把他先送到艾黎那裡去吧。」史沫特萊暗自思忖着。

史沫特萊的妙招

她還沒有張口，陳翰笙從她那興奮又不安的目光中，已經明白了幾分。他知道，一定發生了甚麼情況。

她終於把她的想法告訴了陳翰笙。深怕延誤時間再出問題，幾乎沒有徵得他的同意，就親自把他送到艾黎家。艾黎是宋慶齡的好友。當時他的公開身份是上海租界工部局視察員，家住法租界。他深深同情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不僅掩護過不少革命同志，甚至連當時共產黨中央的秘密電台也設在他家的樓上。

艾黎熱情地接待了陳翰笙，一連把陳翰笙藏了十多天。與此同時，史沫特萊又將由東京隻身趕來的顧淑型安排在另一位德國朋友的家中。事過三十年後，艾黎在同我的

一次交談中還深情地回憶了這段令人難忘的往事。

「能夠幫助翰笙度過險關，我感到一種由衷的喜悅，正是從這件事開始我同這位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卓越代表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人間還有什麼比這種情誼更珍愛？翰笙是好樣的，他當時臨危不懼，一直顯得很鎮靜。」

在陳翰笙隱蔽於艾黎家中的時候，黨組織決定，為了陳翰笙的安全，讓他再一次去蘇聯。

緊張的準備活動開始了。從上海到海參威需要乘船前往，而上船時又檢查得很嚴，任何一點疏忽都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

小心謹慎而又能幹的史沫特萊終於想了一個妙招，她設法買通了船長，由路易·艾黎負責把陳翰笙護送上船，由漢伯克夫人負責把顧淑型護送上船。看樣子，像是兩個中國人送洋大人上船，借以避免軍警的查詢。待陳翰笙夫婦平安登上輪船後，再由船長把他倆鎖在船長專用的小廁所裡，以逃避出港時可能遇上的檢查。就這樣，陳翰笙夫婦離開了上海。

艾黎在一九八七年出版的《艾黎自傳》中，對這段往事還有一段專門的追述：

「我記得，有一天艾格妮絲把一位眼睛近視的中國教授陳翰笙和他的夫人①帶到我家。到他們走的那天，她讓我領他們上一艘即將啟航的輪船，護送他們進船艙，再在開船前鳴笛混亂的幾分鐘走下舷梯回來。

田 森

他們要帶上兩束紅色的唐昌蒲，好像是為別人送行。為了使他們更好地偽裝，我讓他穿上白衣裳和短褲、長襪、棕櫚灘流行的上衣，還戴了頂軟木遮陽帽。他尤其不能戴眼鏡，因為通報他的特徵時肯定會提到這點。

看到這位儀表堂堂的教授戴着不習慣的頭盔卻裝得若無其事，眯起一雙近視眼，透過紅花向前瞅着，心裡巴望他不要摔倒，可真有意思。我們從站在舷梯下的一組包探身邊走過，但他們對顯然像上海典型的闊佬的陳教授不介意地僅僅只看上一眼。我回來告訴艾格妮絲他們已經安全出發，她欣喜若狂，立即提議集會慶祝一番。」



偕同夫人東渡日本。

到東京後，陳翰笙除了在日本文庫做研究員外，經常在東京滿鐵株式會社進步人士中間開展地下工作，由於當時東京的形勢和地下工作的特殊情況，陳翰笙到日本後一直未同左爾格直接接觸，主要是通過曾任《朝日新聞》記者的尾崎秀實進行聯繫。甚至一次陳翰

東渡日本

笙夫婦與左爾格在東京街頭迎面相逢，左爾格都裝着根本不認識的樣子，擦肩而過，連頭也沒點一下。在日本警察十分活躍的東京，他們沒有別的選擇。更何況左爾格是一個極為謹慎幹練的情報專家。這是沒有做過地下工作的朋友們難以理解的。

左爾格在日本建立了「國際反戰小組」，在有近十個國籍的成員中，尾崎也是其中的一個。這個反戰小組組織極為嚴密，他們竟然能在日本警察的眼皮底下整整活動了八年，而且編發了兩萬多份頗有價值的秘密報告，不消說這對共產國際了解二戰中日本的情

況具有重大意義。可以說，左爾格苦戰八年，成果纍纍，為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一九四一年，左爾格在日本的「國際反戰小組」，終於被敵人破獲。三年後，一九四四年他從容就義，死於絞刑，時年僅四十九。

一九四六年蘇聯追認左爾格為蘇聯英雄。一九六五年蘇聯在全國範圍內發行紀念左爾格的郵票。

一九八五年，蘇聯在紀念衛國戰爭四十周年的前夕，又在莫斯科以左爾格命名的街上豎起了他的銅像。要知道，早在蘇德戰爭未爆發前，左爾格就從東京

田 森

為蘇聯最高當局提供了德國將於何時進攻蘇聯的準確情報，接着他又及時地通知蘇聯方面日本關東軍一時將不可能進攻蘇聯而是先同英美交鋒。這是何等重要的情報。可惜剛愎自用的斯大林當時不相信左爾格提供的情報，致使整個反法西斯鬥爭蒙受了難以估量的損失。

當陳翰笙向我講完了左爾格的故事後，一種對反法西斯英雄的尊敬從我的心中油然而升起，聯想到陳翰笙當年在艱難的條件下曾奮力協助左爾格戰鬥，我不由得對他又增添了一份敬重。



一次，左爾格需要到陝西去了，解情況，爲了能順利完成這一任務，他非常需要陳翰笙的幫助，希望陳與他同行。但由於當時局勢極爲複雜，左爾格已不便同陳翰笙直接聯繫，他只好又一次請求史沫特萊通知當時正在南京的陳翰笙立即去徐州車站等候一個人。史沫特萊從上海轉達了這個急切的消息。她甚至沒有對陳翰笙解釋究竟怎麼一回事。根據地下工作的習慣，每逢遇到這種情況時，陳翰笙從來也不進一步追問什麼，而是立刻行動。當時史沫特萊告訴陳翰笙，接頭的辦法是：陳翰笙在指定的時間手提一個打字機在徐州車站等候一個手持報紙的人。

就這樣，陳翰笙匆匆收拾行裝，便赴火車站買了按對方要求時間去徐州的車票，踏上了行程。待抵達徐州站後，他提着打字機正四面張望時，不料迎面走來手持報紙的人竟是左爾格，這令他又驚又喜。待他弄清情況後，也明白了自己的任務。他倆便直奔西安，通過當時在楊虎城身邊任私人秘書的地下黨員南漢辰的幫助，見到了楊將

8 西北之行

囑托的任務。

從山西歸來不久，陳翰笙同左爾格在上海有過幾次對世界形勢的深入討論。左爾格這位第三國際的戰略問題專家，根據他所掌握的各種大量材料，經過周密的思考，斷定第二次世界大戰正悄悄地向人們逼近，而在亞洲，戰爭的禍根則在日本。世界經濟的狀況已經使得東西帝國主義的各種矛盾日益激化，這兩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軍。這次同楊虎城、南漢辰的會晤，使得左爾格了解到陝西地方軍隊實力的第一手材料。左爾格還想對馮玉祥與閻錫山之間的關係有進一步的了解，他請陳翰笙通過適當的關係去拜訪一下馮玉祥將軍。陳翰笙爽快地答應了左爾格的請求，隻身又從西安奔赴當時正在山西的西北軍最高統帥馮玉祥的住所。到處都有朋友的陳翰笙同馮玉祥身邊的重要幕僚查良釗是老朋友，由查引見，他順利地見到了馮玉祥將軍，圓滿地完成了左爾格

田

森

的忠誠戰士都一致認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帷幕會在不太長的時間內被拉開，面臨這樣的新形勢，「我們該怎麼辦呢？」

左爾格想去日本。他的這個意見很快就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批准。臨行前，他希望陳翰笙也能同行。他不僅非常佩服這位中國戰友的機智和才幹，而且也了解他在日本進步人士和滿鐵會社中的影響。

自從楊杏佛一九三三年六月被暗殺後，形勢對陳翰笙極爲不利，但他畢竟還有一些重大的農村調查工作需要國內完成，再說他還在等待着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指示，所以只能留下來。一九三三年九月，左爾格隻身離開上海。陳翰笙沒有料到，這次同左爾格的分手竟成爲他倆的永別。臨行前，左爾格希望陳翰笙能一如既往地幫助到上海來接替他工作的新同志。就這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左爾格不顧自身的安危投入到一個更加險惡的戰鬥環境中去了。



「朋友遍天下」這句話用在陳翰笙與他人的交往上是再合適不過了。由於工作的需要，他的交遊極廣。一次他帶着懷戀的感情向我談起了他同一位比他大兩歲的德國人的友情。那位機智、敏銳、果斷和具有執着獻身精神的朋友就是理查德·左爾格。

左爾格的祖父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老戰友、國際工人運動著名的活動家、德國傑出的共產主義者，後來成爲在美國的第一國際積極活動家的弗里德里希·阿爾伯特·左爾格。

理查德·左爾格是一個德俄混血兒，聰明過人。一九二九年底他作爲第三國際的情報工作者，以德國新聞記者和經濟專家的身份來到中國，時年三十四歲。

左爾格剛到上海不久，就結識了《法蘭克福日報》駐中國的特派記者艾格妮絲·史沫特萊，他們很快就成爲朋友。當時左爾格希望史沫特萊能向他推薦一位了解中國政治和中國軍閥派系鬥爭的朋友。史沫特萊很自然地就想到陳翰笙。在她印象

中，陳翰笙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和了解極爲敏銳深刻，是最合適不過的人選。

在史沫特萊的安排下，陳翰笙與左爾格很快見面了。第一次見面，兩人就很談得來。當時陳翰笙正集中精力研究中國農村問題，他很自然地同左爾格談到，不懂得中國農村問題，就很難了解中國。左爾格此次來中國的任務雖然主要是想瞭解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各軍事派系之間的明爭

與左爾格在一起

田 森

暗鬥以及對待日本的態度等，但他對陳翰笙的談話仍聽得津津有味，他還向陳翰笙要求再結識幾位可信賴的青年朋友。

那時跟隨陳翰笙搞農村經濟調查的有不少出色的青年人，陳翰笙考慮孫冶方頭腦比較靈活，就決定先把他介紹給左爾格。

孫冶方了解到理查德·左爾格乃弗里德里希·左爾格的孫子後，自然很樂於結識他。於是便聽從陳翰笙的安排，當陳翰笙同左爾格在樓上談話時，他靜靜地呆在

樓下，待聽到他們下樓的腳步聲時再出來迎面相遇。這是當時陳翰笙出於地下工作需要設計好的一種見面方式。可沒有料到，孫冶方剛在樓梯口見到左爾格，不等陳翰笙向他介紹，便主動地用俄語向他致意。左爾格一聽有人同他用俄語說話，馬上裝做什麼也沒有聽見的樣子，匆匆地就走開了，弄得孫冶方當時很尷尬。事後孫冶方才明白，左爾格是一位老練的情報人員

，行事極爲慎重，他爲了避免產生任何不必要的因素，決定在中國的公開場合絕不講俄語，所以他對孫冶方用俄語同他交談，只好不得已地拒手回答。對於左爾格這種可能被認爲是不禮貌的舉動，陳翰笙是完全理解的。在險惡的白色恐怖下，任何一點麻痺大意都會給地下工作帶來極大的損失，甚至造成不必要的犧牲。

左爾格從一九二九年底到一九三二年在中國工作了三年，神州大地多處留下了

他的足跡。共同的信仰把他和陳翰笙很快就聯繫在一起，所以一見如故，始終坦誠相見。出於安全的考慮，他們並不能經常見面，但每有機會相聚除談工作外，都必縱論天下，彼此都感到是一種極大的精神享受。陳翰笙非常欽佩左爾格所具有的出色的活動能力。他利用記者和經濟專家的雙重身份在中國開展了極爲緊張的活動。他通過德國在華的軍事顧問團見到了當時國民黨的軍政要員何應欽，後來又通過何應欽的引見，同當時國民黨的外長王正廷，甚至蔣介石本人會晤。然而中國這個大國極爲複雜，要想打開工作局面，殊非易事，所以他在工作中也常遇到一些困難。每逢這時，他就想到請求陳翰笙幫助。這不僅因爲他通過特定的途徑了解到陳翰笙的身份，而且從第一次見面起，他憑着自己的職業嗅覺，就對陳翰笙產生了好感；在他看來，陳翰笙這個學者型的革命家，不僅可信，而且具有一種打開局面的能力。



爲了更進一步弄清中國農村社會的諸種問題，一九三三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發起人以陳翰笙爲首，還有吳覺農、孫治方、薛暮橋、錢俊瑞等。理事會由全體會員選舉產生，前後改選過五次，可這五屆的主席一直是由陳翰笙擔任，足見衆望所歸。

研究會註冊時還有一段有趣的插曲。研究會位於上海法租界，需在法駐滬領事館註冊。爲此陳翰笙到法國領事館去辦理手續，那天卻巧遇國民黨外交界著名人物顧維鈞，於是他倆便在領事館聊了起來，法國人見陳翰笙同顧維鈞在聊天，誤以爲研究會可能與國民黨有密切聯繫，不可小覷，所以幾乎沒費口舌，法國領事館便爽快地辦了登記手續。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發展得很快，不久它的成員已達五百多人。他們還出版了自己的機關刊物《中國農村》月刊，在當時很有影響。

多少年來，陳翰笙雖然在很多學術領域內辛勤勞動，但他始終都極爲關注二十年代末他在中國倡導用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觀點所進行的這場社會調查。到了晚年，在他八十六歲的時候他又一次親赴安徽滁縣對中國農村體制改革進行了認真的調查。他的工作作風也給當地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當他剛一抵達農村改革的發源地鳳陽城時，便立刻對接待人員說要到縣委去匯報他這次社會調查的具體設想。鳳陽由於它在農村改革中的地位，已經接

待過來自各地的無數客人，可像這樣一位來自中央、剛一下車就要求去縣委匯報的部長級來賓卻從未遇到過。

當時《滁州報》有這樣一則報道：

「陳翰笙同志不僅聽取了地委書記王郁昭、副書記陳庭元等負責同志關於我區情況的介紹，對農村一些政策問題親切地交換了意見，而且不辭勞苦，冒着春雨，踏着泥濘小道，前往滁縣琅琊公社花園大隊上華生產隊登門訪問社員，並在社員家中召開幹部、社員座談會，同大家共商勞動致富大計，研究包乾到戶責任制的發展前途。」

他這次社會調查歷時四天，時間雖短，卻頗深入，他不顧雙

社會調查的楷模

田森

腿濺滿了泥漿，在難以行走的羊腸小道上徐徐前行，親自走訪好多家農戶，取得了第一手

資料。要知道，其時他已經是八十六歲的老人了，且雙目幾近失明。他的這種深入基層搞社會調查的精神是多麼可貴啊！

所以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不僅是我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先驅，而且也是當今我們從事社會調查的楷模。

直到今日，他始終對中國社會學的發展狀況極爲關注。在我們之間的無數次交談中，他經常詢問有關當今社會學的研究動向，還不時地發表一些中肯的評論。從二、三十年代搞社會調查到現在，六十多個春秋過去了，世界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而陳翰笙對社會學發展的關切，依然如初。



所做研究員。

李大釗遇難後，陳翰笙已無法在國內呆下去。在日本朋友中江丑吉的幫助下，他取道日本赴莫斯科，被安排任共產國際農民運動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失敗後，共產黨內有一種理論認為，造成失敗的原因是由於中共沒有弄清中國的社會性質，因而採取了錯誤的方針政策。在共產國際農民運動所中，有一個叫做馬季亞爾的匈牙利人甚至公開提出，二十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傳入中國後，中國也就成了資本主義，因此中國的農村自然也就是資本主義的農村。陳翰笙當然不同意馬季亞爾的觀點，同他就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展開激烈的論戰。在陳翰笙看來，「中國農業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封建社會性質。但是由於不了解中國農村的具體情況，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實例來駁倒馬季亞爾。」

正是莫斯科的這場爭論，引發了陳翰笙對「中國社會做一番全面的調查研究」的志向，而同中共領導人之一蔡和森的一次徹夜長談更堅定了他的決心。那次談話涉及的範圍很廣，其中蔡和森特別強調了研究中國社會農民問題的重要性，這一點

給陳翰笙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一九二九年春，陳翰笙回國主持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他上任後第一件事是任用有作為的進步青年。他聘用了王寅生、錢俊瑞、薛暮橋、張錫昌、張稼夫、孫冶方、姜君辰等有為的年輕人，接着便狠抓資料工作。但要擁有豐富的資料，首先要有錢，可所裡的經費是有限的。他利用自己的影響找到了當時擔任鐵道部部長的顧孟餘，待顧了解陳翰笙的來意後，當即表示聘陳為鐵道部顧問，每月工資四百元，

中國城鄉社會調查

田 森

查社會，還特地用老百姓吃的樹皮和草根編成「飢民之食」幾個字，用膠水貼在所內辦公室的牆上。

陳翰笙組織的包身制的調查早已引起了國民黨的不滿。有人在陳翰笙的辦公桌上貼出了「恥與赤匪為伍」的標語，然而陳翰笙非但不怕威脅，而且進一步制訂了把社會調查從城市轉移到農村去的規劃。他曾先後同張稼夫、孫冶方、錢俊瑞、張錫昌等人在江蘇無錫、河北保定、河南許昌、山東濰縣、安徽二十里堡以及廣

讓他用這筆錢來補貼社會科學研究所的調查資料費。這位同李大釗亦有交情的顧孟餘真是幫了陳翰笙的大忙。

調查是先從上海日資紗廠的包身制開始的。日本紗廠包身制的調查如實地記錄了中國無產階級在飢餓線上掙扎的悲慘景象並揭露了工人階級受到的殘酷剝削。調查報告指出，女工包身制度的盛行是中國農村經濟衰落所造成的，是「現代勞動僱傭制度在中國特有之現象。」

陳翰笙為了激勵所內研究人員認真調

東中山縣等地方，深入調研了當時舊中國農村社會的各個側面。

陳翰笙十分清楚，不了解中國農村，也就永遠不可能了解中國社會。他還在山東、河南、安徽三省煙草區和廣東蠶桑區等經濟作物地區做了深入細緻的調查，以大量事實雄辯地說明了中國的農村經濟根本不足馬季亞爾和托派所說的資本主義性質，而是地地道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陳翰笙在他著名的調查報告《廣東農村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中，用鐵的事實論

證了當時我國農業生產力不能發展的根本原因「應該從農村生產關係中找尋」。

對於二、三十年代，陳翰笙在中國率先以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觀點進行的中國社會調查，他自己在《四個時代的我》一文中有段總結：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這次農村社會調查，其範圍、時間、影響都是空前的。我終於能夠以大量第一手資料和充分的事實來駁斥馬季亞爾及中國托派的謬論，也揭穿了當時國民黨政府關於「農村復興」的謊言，為我黨在農村實行正確的策略提供了可靠的依據。我是共產黨地下黨員，國民黨是不知道的，這次調查是在國民黨民主人士蔡元培和楊杏佛的支持和保護下，利用合法機構和合法身份進行的，不僅在理論上取得了很大成就，而且鍛煉出一支專業理論隊伍。」

當時在陳翰笙領導下參加中國農村社會調查的不少進步青年，如錢俊瑞、薛暮橋、孫冶方等後來都成了新中國著名的學者，陳翰笙培養的一批人才在建國後的學術研究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百齡耆宿陳翰笙》之九）

（更正：昨文「蔡子民」為「蔡子民」之誤，合更正。）



一九八〇年三月四日，蔡元培逝世四十四週年之際，《人民日報》在顯著地位刊登了陳翰笙寫的〈追念蔡子民先生〉一文。

在這篇文章裡，陳翰笙以三句話概括了蔡元培的一生：「人格高尚，學識淵博，功績巨大。」確實，這字字句句都凝聚着他對蔡元培的無比崇敬之心。

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後，大力整頓校風，提倡學術民主、思想自由，實行「兼容並包」的辦校方針，所謂兼容者意在吸收具有先進思想的新派人物來北大任教。

二十年代初，蔡元培在歐洲考察時，聽說德國柏林大學出了一個優秀而年輕的中國籍歷史學博士，就頗關注上「陳翰笙」這一名字。思賢若渴的蔡元培決定破格聘請他為北京大學教授。當他派人告訴陳翰笙這一決定後，陳翰笙欣然接受，當即返國任教。

當陳翰笙登上北大講壇時，蔡元培還在歐洲繼續考察。當時北大的校長是由蔣夢麟代理的。

一九二七年李大釗遇難後，陳翰笙被黨派往莫斯科共產國際工作，一年後返國。

一九二八年當陳翰笙由莫斯科返國的時候，他的第一個念頭就是趕緊去看望蔡元培。

此只能神馳，無法相會。所以上海的這次會晤就顯得格外令人興奮。當時國民黨政府中央研究院就設在上海，蔡元培當即邀請陳翰笙到他的研究院來工作。能夠在蔡元培手下直接從事學術研究自然是再理想不過，陳翰笙為此興奮不已。

可是沒過多久，一個壞消息便傳來了。由於負責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的王世杰早在編《現代評論》雜誌時就認識陳翰笙，他知道陳翰笙是左派，和他這個國民黨大右派是無法共處的，所以堅決不同意接納陳翰笙，弄得蔡元培也不好一意堅持，只得把陳翰笙介紹給負責商務印書館的

蔡元培伸出了援助的手

田森

王雲五，這樣他同王雲五簽訂了一年合作，負責審閱商務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

知人善任的蔡元培知道商務印書館絕非陳翰笙用武之地，所以當王世杰剛一調任南京國民政府法制局局長，他立即約見陳翰笙，要他準備到中央研究院來接替王世杰的工作。

蔡元培的工作作風非常細緻，他考慮如果直接任命陳翰笙為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必將繼續遭到院內國民黨右派勢力的反對，所以他想了一個好主意，由他親兼所長，委任陳翰笙為副所長。其實，所裡的工作，他是完全放手交給陳翰笙去做的。

當陳翰笙主持的社會科學研究所完成了日資上海紗廠包身制的調查，並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後，國民黨右派大為惱怒，發起了攻擊。蔡元培一方面親自出面頂住右派的壓力，為陳翰笙他們作後盾，另一方面又建議他們不妨把調查的重點先放到農村去。

對於當時蔡元培在白色恐怖下所給予的支持，陳翰笙是極為感激的，他曾動情地對我說：

「如果沒有蔡先生的支持，別說當時社會調查搞不成，恐怕連腦袋都難保，我一生中在危難之際經常得到朋友們的幫助，如果沒有這種幫助，哪裡還可能有今天啊！這也是為甚麼我養成樂於助人習慣的一個原因。」

陳翰笙同蔡元培的最後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三九年五月，當時他奉命由美去港協助宋慶齡工作。早在此前，潘漢年就曾奉黨中央委託指示陳翰笙說，「以後黨內的事就由你同宋慶齡保持聯繫好了。」抵香港不久，陳翰笙就急於到九龍柯士甸道去探望當時隱居在那裡的已年屆七十一歲的蔡元培。那次見面，他們很自然地談到時局問題。陳翰笙至今還記得，當時蔡元培伸出大拇指，連聲地說：「周恩來了不起！」那意思是誇獎他出色地解決了西安事變，促成了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局面。

陳翰笙對蔡元培推崇備至，絕非因為私情，而是為他的人格力量所折服。我問過陳翰笙，蔡元培人格的偉大主要表現在甚麼地方？他用了八個字回答了我的問題：「言行如一，雍容大度。」



一九二七年一月，經李大釗同意，陳翰笙受聘於國民政府外交部，擔任外交部部長

陳友仁的顧問。當時李大釗考慮，陳翰笙有這樣一個外交部顧問的銜頭做掩護，更便於從事革命活動。那時國民政府設在武漢，陳翰笙只好離京赴任了。

風雲多變，陳翰笙出任外長顧問還不到兩個星期，國內形勢發生很大變化，蔣介石策劃背叛革命的跡象越來越明顯。情況危急，李大釗急於要把這個重要動向告訴陳翰笙，共商下一步對策，所以特發急電，促他火速返京。陳翰笙接電後摸不清是怎麼一回事，但既是李大釗的指示，他就不去多想了。可如何去對付陳友仁呢？他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決計謊稱母病重，只好請假返鄉，一俟母病好轉當即返回。面對這樣的理由，陳友仁也不好拒絕，只得讓他走了。

返京後，陳翰笙冒險去探望李大釗，這才知道蔣介石正在南昌策劃籌建新的國民黨中央，一時中外不少政客齊集南昌，形勢

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顧問

田 森

極為險惡。共同分析了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後，李大釗從當時的局勢出發，叮囑陳翰笙此時此刻以隱蔽起來為上策。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舉世為之震撼：由於國民黨右翼北大教授李石曾的告密，張作霖的數百名武裝警察置國際慣例於不顧，公然包圍了蘇聯駐華大使館，強行衝進中東辦事處將李大釗逮捕，並於當月二十八日將李大釗秘密處死。

敵人的卑鄙行徑，激起了進步人士的無比憤怒，反動派可以奪走李大釗的生命，卻無法消滅他的精神、他的思想。李大釗在被捕後曾遭敵人嚴刑拷打，始終不屈。他的妻女也被反動派同時逮捕，關於牢房內，可他不僅對他們從不提家事，反而繼續在獄中指導獄外鬥爭，直至生命最後一息。

從李大釗身上陳翰笙看到了一顆高尚而又聖潔的靈魂。李大釗的遇難令他悲慟無比，長久地陷於一種茫然若失的痛苦之中。然而李大釗的精神也在呼喚他更進一步地奮起，堅定地沿着李大釗指引的道路走下去。

人與事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在北京發生了一件震憾世界的反帝反軍閥政府的遊行事件，史稱「三一八慘案」。三月十八日北京的愛國群眾，爲了反對英、美、日等八國的最後通牒，在李大釗的親自領導下，在天安門前集會，通過了六條議案，隨後浩浩蕩蕩的游行隊伍又到鐵獅子胡同段琪瑞執政府門前請願，遭到軍閥段琪瑞的鎮壓。槍彈就像雨點似的落到群眾身上，許多人在血泊中倒了下去，也有相當多的人被活活踩死。當時李大釗親自扛着一面紅旗走在示威行列的最前面，只是由於廣大群眾的保護，他才倖免於一死，但頭部和雙手都受了傷。陳翰笙從頭到尾都在現場，他向群眾散

三·一八慘案後

田 森

歷了整整的一年時間，在這期間，李大釗和陳翰笙彼此間進一步了解使他倆的關係更密切了。可以說，陳翰笙一直是在李大釗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獨立作戰。

李大釗對調查研究極爲重視。他不止一次對陳翰笙說：「一個革命政黨要想制定正確的方針，必須對世界、對國情、對民情做個密細緻的調查。」所以陳翰笙花了很大力氣了解國內外的情況，及時寫成有份量的報告，供李大釗決策參考。陳翰笙所做的社會調查，對李大釗幫助極大，深受其讚賞。

「三·一八慘案」後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白色恐怖更嚴重了。在李大釗的住處蘇聯大使館門前佈滿了密探，跟蹤去使館

的人。陳翰笙是經常到館內去探望李大釗的人，當然受到了密探的注意。環境日益險惡，爲了安全的

中，他的一隻手錶被段祺瑞政府的警察搶去，緊接着槍聲大作，陳翰笙飛速地卧倒在地，未被槍彈擊中。待他起身時，同輩的鮮血已覆蓋大地。陳翰笙悲憤填膺，回到寓所中，他再也壓不住內心的怒火，奮筆疾書，寫完了我們在前邊曾經提到的那篇題爲《三月十八日慘案目擊記》的文章，淋漓盡致地揭露了北洋軍閥政府對愛國群眾的血腥鎮壓。難怪三月十八日這一天被魯迅稱之爲「民國以來最黑暗的日子」。

「打那以後北洋政府通緝李大釗。出於安全的考慮，大家都勸他離京，可他置個人安危於不顧，堅決留下來繼續領導北京的革命工作。」

從三·一八慘案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李大釗被捕，中間經

考慮，李大釗和陳翰笙的直接接觸必須減少。那段時期，李大釗的指示往往要通過別人來傳達。陳翰笙沒有忘記一位叫做張亦男的北大女學生，正是她擔負着同李大釗秘密聯繫的使者角色。李大釗的許多指示通過她告訴陳翰笙，而陳翰笙向李大釗的彙報也由她轉達。不消說，張亦男這位可敬的女性是冒着極大風險來完成這項特殊使命的。有時李大釗也通過郭隆真同陳翰笙聯繫。除此而外，爲陳翰笙和李大釗之間進行秘密聯絡工作的尚有陳翰笙夫人的胞姐顧淑禮，她扮演了蘇駐華使館中文教師的角色，通過蘇使館官員安德烈也夫幫助，同李大釗直接接觸。

（百齡書宿陳翰笙）之六

人與事



隨着接觸越多，李大釗對陳翰笙也越信任。他的朝氣、認真、明快、敏銳都給李大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的中國正處於內憂

外患、民不聊生之際，爲了拯救風雨飄搖中的祖國，陳翰笙不僅奮筆撰文喚醒民衆，而且深入到社會實際中去，做各種調查，參加各種群衆活動，甚至連學生到南京去請願的愛國行動，身爲教授的他也前往車站親自送行，爲學生們鼓氣。事隔幾年後，他依然記得他是怎樣送走學生們的。那一段時期，他經常去看望李大釗，把自己了解到的情況及時告訴他。

陳翰笙在思想上的進步令李大釗欣慰不已，他逐漸成爲深受李大釗信賴的同志。五卅慘案爆發後，李大釗要陳翰笙以《現代評論》雜誌記者的名義趕赴上海租界動員外國巡捕罷工。爲此陳翰笙迅速地籌集到一大筆錢做爲活動經費，可終因數目不足而策動未果，但這次活動卻使陳翰笙獲得了不少經驗，同時也結識了當時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的陳雲和李立三。

形勢越來越複雜，五卅慘案後，民衆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不滿與日俱增，大量的工作等待着人們去做。爲了更好地發揮陳翰笙的作用，李大釗果斷地把他介紹給當時的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

那時，白色恐怖籠罩了整個京城。出於安全的考慮，李大釗和中共領導機關搬到了位於蘇聯大使館西院的中東鐵路辦事處。當時李大釗的住處對外是絕對保密的，去看他時必須通過蘇聯駐華大使館內

從事地下工作

田森

的一道矮牆，登上扶梯才能抵達李大釗的住處。一天，李大釗親自帶着陳翰笙向加拉罕的辦公室走去。他倆的辦公處相隔不遠。

加拉罕，四十多歲，不高的身材，有着一雙深邃的眼睛，他的外表顯得比實際年齡大一些。從他前額的皺紋和面容看，可以感到這是一位飽經滄桑的戰士。他非常熱情地接待了由李大釗親自陪同來的這位年輕教授，他們從政治問題談到歷史問

題，討論是非常坦率的。那次談話給陳翰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拉罕從大使館同事口中對這位青年經濟學家、歷史學家早有了解，所以他鄭重地請他今後多爲共產國際的刊物《國際通訊》撰文，接着又把他介紹給當時在使館擔任文化參贊的年輕人加托諾維奇。由於年齡相仿，又都懂英文，他們很快就成爲好朋友。

在加托諾維奇的引見下，陳翰笙結識了不少蘇聯朋友，他們中間有在俄專任教

的彼得·格林涅維奇、蘇聯塔斯社駐北京記者繆辛、歷史學家潘克拉托夫等人。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他同彼得的交往，這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年輕人。他倆每周照例要聚會，經常徹夜漫談，從《資本論》到《戰爭與和平》，從社會主義蘇聯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什麼都討論。在彼得的幫助下，陳翰笙再讀《資本論》，使他深受教益。有時因爲同彼得討論得太晚了，他索性就在彼得處住下。陳翰笙

在回憶這段往事時滿懷深情地說：「彼得是此生給予我影響頗大的一位朋友。」繆辛和潘克拉托夫也都是很討人喜歡的俄國朋友。前者不斷地爲陳翰笙提供塔斯社的新聞稿，擴大他的視野，後者是一位同陳翰笙頗有共同語言的歷史專家，特別是對蒙古史尤有研究。正是同俄國友人日益深入的接觸，對陳翰笙爲李大釗整理國際問題材料提供了方便。

同加拉罕會晤後，陳翰笙便開始不斷地爲《國際通訊》就當時中國的重大時局問題撰文，前後大約寫了好幾十篇之多。具體的數目他已記不很準確了，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那時共產國際正是通過陳翰笙的文章來了解中國形勢的。他的文章寫得既及時，又中肯，深受好評。後來李大釗又向陳翰笙轉達共產國際方面進一步要求，要他不僅爲他們寫文章，還要爲他們擔負一些情報工作，因爲此事是由李大釗親自出面過問的，所以他答應下來了，這就是他從一九二六年開始爲共產國際做地下工作的經過。

（《百齡耆宿陳翰笙》之五）

人與事



一九二四年的秋天，在陳翰笙的生活中發生了一件極為重要的事件。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正面臨何去何從的問題。以振興中華為己任的陳翰笙因為剛從海外歸來不久，對國內形勢正缺乏足夠的了解，他正在探索未來的路該怎麼走下去。就在這個關鍵時刻，通過新中學會領導人之一于樹德的介紹，他結識了當時也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李大釗先生。

那是一個秋天的下午，秋風習習，秋蘭飄香，陳翰笙來到了李大釗的家。李大釗對這位北大最年輕的教授的到來，非常高興。這位無產階級的革命領袖緊握着他的手，把他讓到裡屋去。

對於陳翰笙的才學，李大釗早有所聞，他也知道陳翰笙是新中學會的成員。對於這個進步團體李大釗是極為關心的，當年曾建議把新中學會和少年中國學會聯為友會的正是李大釗。

他們沒有很多寒暄，傾心的交談便開始了。

陳翰笙非常敬重李大釗，他十分珍惜這次難得的會晤，用一種求教的口吻同他

討論當時的形勢。那時候在北大，各種思潮都非常活躍，教師隊伍中基本上分為兩派，一派以胡適為代表，另一派以李石曾為首。兩派明槍暗箭，相持不下。

李大釗對這位滿腔熱情尋求真理的青年教授關懷備至。他告訴陳翰笙「要緊的是必須努力掌握唯物史觀這個銳利的思想武器，這樣在研究社會各種紛繁複雜的現象中，才可免於墮入萬里雲霧之中。」並建議陳翰笙要認真地讀《資本論》。當時

在李大釗的領導下

田森

李大釗非常忙碌，外地來訪者絡繹不絕，但每遇陳翰笙仍不斷督促他在《資本論》上狠下功夫。

在李大釗的親自指點下，年輕的陳翰笙發奮學習馬克思主義。他讀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特別是《資本論》，他向李大釗表示要加入共產黨，李大釗對他說：「如今是國共合作，為了加強國民黨內共產黨的力量，你還是先加入國民黨對革命更有利。」就這樣，經李大釗親自介紹，他加入了當時國共合作的國民黨，那是

一九二五年的夏季。

當時為追求真理找李大釗求教的青年很多，後來成為著名史學家的侯外廬就是其中的一個。出於對陳翰笙的信任，李大釗當時特地建議侯外廬要多和陳翰笙接觸。根據後來侯外廬的回憶，當時李大釗對他說：「陳翰笙是比較接近馬克思主義的。」正是由於李大釗的介紹，後來陳翰笙同侯外廬保持了半個世紀的友誼。

李大釗處理問題從來站得高，有一件

事給當時的陳翰笙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九二五年初，孫中山北上，大元帥職務暫時由留在廣州的胡漢民代理，可胡漢民是國民黨的右翼領導人，他乘機指示當時任北大教授的王世杰以國民黨西山會議派為後盾，團結北大歐美自由派的教授如胡適、陳西滢等創辦《現代評論》雜誌，把矛頭對準中共及其領導的左翼運動。為此胡漢民特地給了王世杰五千大洋。由於陳翰笙這個留學美歐歸來的年輕教授在國際上的影響，他也被聘為《現代評論》雜誌的編

委。陳翰笙知道自己和他們不是跑在一條軌道上的人。他究竟該如何進退呢？為此，他請教了李大釗。李大釗幾乎是不經思索地對他說：

「不要脫離那些標榜自由主義的歐美派學者，要同他們接近，並且學會利用他們的刊物來宣傳有利於我們的主張，這樣做有時比利用我們自己的刊物來宣傳我們的主張更為有效，更為有利。」

李大釗說話每每不多，言簡意賅，但幾乎每次都令陳翰笙茅塞頓開，這一回他不僅認識到繼續留在《現代評論》雜誌的必要性，而且以積極的態度參加了它的工作，按照李大釗對他提出的要求，經常在該刊上發表文章。後來那篇題為《三·一八慘案目擊記》的揭露段祺瑞政府賣國行為和鎮壓北京群眾運動並紀念死難烈士劉和珍的文章就是發表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出版的《現代評論》上，在當時產生了一定影響。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他在《現代評論》上發表的文章有五十三篇之多，內容十分廣泛，有論國際關係、英美狀況、蘇聯動勢的等等，利用右派輿論陣地，傳播進步思想。

《百齡書宿陳翰笙》之四